

ANARCHISM

a marxist critique

JOHN MOLYNEUX

special edition -
extra readings inside



安那其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

约翰·莫利纽

目录

[安那其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

[前言](#)

[安那其主义的诉求](#)

[安那其主义思想](#)

[国家](#)

[领导](#)

[党](#)

[个人、社会和阶级](#)

[安那其主义的历史记录](#)

[巴枯宁](#)

[俄罗斯](#)

[关于安那其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的说明](#)

[西班牙](#)

[今天的安那其主义——一些当前问题](#)

[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

[自治主义](#)

[安那其纲领主义](#)

[直接行动](#)

[参加选举](#)

[运动中的决策](#)

[前进的道路](#)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前言

这本小册子的第一版是我在大约十八年前，东欧和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政权崩溃后，与康纳·科斯提克（Connor Kostik）

一起编写的，以法语和西班牙语出版，只是没有用英文出版的。2010年11月，我开始修改和更新英文版。后来爆发了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随后是利比亚、巴林、也门和叙利亚如今仍在进行的史诗般的斗争），这必然将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

然后，2011年5月15日，数千名西班牙人在开罗解放广场^[1]的鼓舞下，在全国地方选举前一周占领了马德里的主要广场Puerta Da Sol，抗议失业、无家可归和整个腐败的政治制度。他们称自己为“*los indignados*（愤怒）”，并谴责所有主流政客和政党。“他们不代表我们！”发出了群众最真实的需求，他们要求“真民主！现在！”几天之内，他们的帐篷就占领了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当然最重要的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的广场也包括在内。远至布鲁塞尔和都柏林的西班牙社区也纷纷举行声援集会。6月19日，近百万人，也包括巴塞罗那的25万人，游行声援，带着*los indignados*。5月25日，就连雅典宪法广场也建立了类似的营地，作为大规模抗议和总罢工的中心反对欧盟/货币基金组织（EU/IMF）对希腊人民实施的严厉紧缩措施。

总的来说，这是场年轻、和平、充满活力和热情的运动，并且显然是受到各种形式的安那其主义或自治主义的运动，或者至少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它在他自己的总议会中直接民主地作出决定，让一切政党，一切政党的条幅、旗帜、报纸等都滚出了广场。简言之，它戏剧性地证实了这本小册子开篇的话。

安那其主义一直对那些反抗这个腐朽社会的人有强烈的吸引力。特别是吸引年轻人，这是它非常值得赞扬的地方。

同时，这些事件为推动这一批判性研究的更新和再版提供了有力的论据。*los indignados*斗争，是由2008年8月雷曼兄弟破产导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而引发的国际上愈演愈烈的斗争浪潮的一部分。希腊工人阶级的持续抵抗、法国工人为养老金而进行的斗争、2010年底的英国学生起义、突尼斯和埃及着实惊人的革命以及阿拉伯之春的余波、威斯康星州的群众运动，以及英国工人在3月26日的大规模示威和6月30日的罢工，早已一浪高过一浪地爆发了。希望到这本小册子出版时，可以发展起来更多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安那其还有安那其主义思想和情绪的激增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968年伟大的斗争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巴黎的五月风暴和当时的普通学生运动中；1999年在西雅图开始的国际反资本主义运动中也是如此。安那其主义的鲜明特征——与国家和权威的彻底决裂、对腐败的议会政治和自私自利的政党的完全拒斥——与年轻人和新激进分子的自发反叛产生强烈共鸣。当人们对旧的**共产党**的历史性衰落和消失这种可恶的印象变得深刻，以及传统社会民主党义无反顾的右转以后（布什和贝卢斯科尼^[2]）最好的朋友托尼·布莱尔^[3]），左派就出现了如此大的真空。此外，安那其主义的发展方式本身就很受欢迎，为运动带来了想象力和天赋，包括新的战术和更多的可能性，比官僚主义和例行公事的烂手更可取。

但这并不就是说，安那其主义思想可以构成这个运动的完美的行动指南——不幸的是，它根本做不到。（不幸的是，我这样说，是因为这种思想的事件绝不能终结无止境而乏味的政治劳动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我得说，每一个“左派”，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每一个革命者，都应该本着团结、合作和愿意学习的精神，与这些安那其主义影响的运动合作——从马克思以来一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从这些运动中学到的——但他们也需要讨论并尝试说服他们，因为安那其主义思想，以及比起马克思主义更接近安那其主义的自命不凡的自治主义思想，有一定的**根本上的**弱点。显然，这本小册子是要展示这些弱点的，但在这里我只想举一些从最近的经验中汲取的例子。

首先，在西班牙的斗争。如上所述，这场运动的主要口号是“他们（政府和官方政客）不代表我们”和“真民主！现在！”推广这些口号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他们刺入了议会民主这个骗局的心脏，即人民每四、五年就能在一堆骗子中选一群政客来歪曲事实，来骗！来！抢劫！他们这些小韭菜！而真正权力仍然未经选举地、不负责任地保留在大企业的董事会和国家官僚机构的办公室里。然而，也有一个严重的问题。*Los indignados*完全可以要求“真正的民主”，但他们实际上该如何得到它呢？显然，这不是只是做出要求就能满足的一个需求；建立“真正的”民主，抗议者是在说“直接民主”，至少是在说要求西班牙政府和国家机构自己解散自己。当然，这个运动可以回应说，它正在通过广场上的大会建立自己真正的民主，这当然也是一个

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它却也仅仅得到了对广场的民主控制，而不是对更广泛的社会民主控制。它对经济、警察、军队或西班牙社会的任何主要权柄没有任何权力，也没有获得这种权力的战略或途径。

实际上，要在社会上建立真正的民主，而不仅仅是在广场上建立真正的民主，至少需要：a) 取代或解散现存的国家制度，以基于直接民主的国家制度取而代之；b) 尽管富人和所有现存当局不遗余力地抵制，但矛盾的积累和动员群众最终能够带来一种变革，即一场革命。这反过来又需要制定一项政治战略，使大多数普通劳动人民不仅走上街头，而且与他们的工作场所，也就是经济力量的基础接触并对其采取行动。换句话说，必须超越对国家、领导和政治组织的单纯的抗拒，而这正是安那其主义的典型特征。

第二，埃及的革命。乍一看，这场革命似乎证实了安那其主义最疯狂的梦想：令人憎恶的暴君被一个人民自发的大规模反抗打倒在地，有主要由年轻人组成激烈的街头巷战，通过Facebook和Twitter动员起来。的确，这一图景有一定程度的道理。伟大的革命（包括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和俄罗斯革命）基本都是自发开始的，埃及革命迄今尚未得到任何单一政党或政治力量的指挥或领导。但是，仔细观察也确实揭示在这些整体自发性背后也有许多强硬的政治组织。

2011年1月25日开始的起义并非突然爆发。它是由1月14日突尼斯革命的成功引发的，但它是也多年来由民主斗争、反帝国主义斗争和工人斗争共同铺垫的。在这些斗争中，安那其主义思想几乎没有影响，但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纳塞里特·卡拉马党和革命社会党在内的各种政党发挥了重大作用。此外，2008年的罢工浪潮中出现了独立工会（以前的工会由穆巴拉克政权控制），这些工会在革命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革命本身中，这些政党一直积极参与，其他政党也已经建立起来。

特别有趣的是穆斯林兄弟会所扮演的角色，该兄弟会是埃及最大的反对党。在独裁统治下，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谨慎的温和改革派政党，虽然是伊斯兰的，但不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或者恐怖分子。在某些方面，它比起基地组织更接近于英国工党，但它是非法的，经常受到迫害。它反对最初在1月25日的示威，但随着革命获得群众的支持，它屈服于压力，允许其年轻成员参加。所有意见都表明，穆

斯林兄弟会青年随后在2月2日对抗亲穆巴拉克暴徒的骆驼战役的生死搏斗中，在与警察作战和保卫解放广场的战斗中发挥了英雄般的作用。当穆巴拉克倒台并被军政府取代后，兄弟会转而支持政府，反对进一步的抗议活动，这让许多青年离开了这个组织。不过，当我写这些话时（7月8日星期五），解放广场被群众占领，其中涉及大约20个政党，要求加快革命步伐，兄弟会也表示支持！

任何希望看到埃及革命继续下去，希望看到埃及走向“真正的民主”，当然也希望推翻资本主义的人，必须从战略和战术上处理这些矛盾，就像他们还必须知道如何与发展中的独立工会合作，以及如何将民主要求与社会和经济要求结合起来一样。这样才能集中和凝聚刚觉醒的埃及群众的巨大革命力量。不幸的是，处理矛盾、从战略上和战术上运作并不是安那其主义的强项，一刀切地拒绝所有政党、工会和旗帜，西班牙的 *la indignados* 只会完美地躲开那些提出矛盾的人。今天在埃及，对现实的运动坐视不理，说什么我们必须等到大批埃及工人摆脱对宗教、军队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幻想，成为真正的安那其云云，也绝不应该是一种选择。早在那之前革命的时机就会溜走，然后社会主义者、革命者——无论是安那其、托洛茨基主义者、列宁主义者还是别的什么——就会发现自己被关在埃及的监狱里。

换言之，时事证实了这本小册子的基本论点，即过去一百五十年的经验无可置疑地表明，尽管安那其主义思想（以各种形式）具有相当的优点，但并没有改变世界的可行方式。

安那其主义的诉求

安那其主义一直对那些反抗这个腐朽社会的人有强烈的吸引力。特别是吸引年轻人，这是它非常值得赞扬的地方。在每一个激进和革命的运动中，年轻人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年轻、不可摧毁和不屈不挠，这样的人拥有比所有人都要充沛的活力、热情和理想主义。

面对猖獗的剥削和不公正，面对资产阶级国家压倒性的力量及其对意识形态令人窒息的紧握，安那其主义公然造反。它说，我们绝不必这样生活，绝不必有富人和穷人，绝不必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绝不必有战争、种族主义和压迫，也绝不必由少数人控制多数人，甚至也不必由多数人控制少数人。

它反对这种不断灌输的谬论：即人民本质上是愚蠢而自私的，必须有人告知他应该做什么，并与权威保持一致。它公开宣称，我们终有能力互助合作，和睦地生活。

安那其主义轻蔑地驳斥了资产阶级（建制派）政治的那种道德家愤世嫉俗的机会主义和虚伪，政客们像卖肥皂粉一样包装和推销自己，而政策则受毫无原则的民意测验的摆布。特别是，安那其主义表达的是对主流左派与腐败的官方政治世界的逐渐合流的反应。它激进地表达了一般民众的普遍看法，即所有政治家都是一样的，只是想要为自己攫取权力和整理口袋。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安那其主义在整个欧洲重新崛起也就不足为奇了。社会改良主义还有社会民主主义在其历史上很少如此公开地跪倒在体制面前，或者如此明确地与国家站在了一起。更重要的是东欧和俄罗斯所谓的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世界上曾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认为这些国家是替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实际可行的办法，但1989-92年的事件无情地揭穿了这种幻想，不仅表明了官僚统制经济的惨败，而且显示了民众对这些政权巨大的仇恨。斯大林主义，这个传统的，统治了60年的，在国际上指挥着如此多左派的思想，崩溃了，或多或少地由此产生的失望情绪远远超出了共产党本身的范畴，蔓延到所有这

些认为东方在某种程度上优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人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料想到，一些寻求激进替代方案的人会将安那其主义视为唯一仍然洁白无暇的意识形态。

安那其主义作为某种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对于主要生活在贫困、频繁失业、经常无家可归，或者偷偷住在不合法的地方，或者住在最廉价的租房中的年轻人来说，安那其主义象征着他们对拒绝他们的制度的拒绝。

然而，拥有崇高的目标和强大而多样的吸引力并不能保证一种意识形态实际上有潜力实现它所宣称的目标。例如，斯大林主义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对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事实证明，搞斯大林主义完全是自寻死路。那么，安那其主义是一种能够指导人类的解放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意识形态吗？

这本小册子将论证安那其主义的基本思想存在严重缺陷，并导致一种可能阻碍解放斗争的做法。它将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4]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是斯大林主义）对安那其主义理论和实践做出批判，并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安那其主义才能指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安那其共同最终目标的未来无阶级的自由社会的道路。

安那其主义思想

安那其主义有多种形式。有拒绝一切形式组织的纯粹的安那其个人主义。有许多小型安那其主义组织。有些安那其宣称他们对不论阶级如何的一切人都有信心。有些安那其共产主义者把目光投向工人阶级。有农民组织的马赫诺（革命后俄罗斯内战期间的农民领袖）的安那其主义。有驳斥工会的安那其主义。有以工会为基础的安那其工团主义。有安那其革命主义、安那其恐怖主义者、安那其和平主义者、安那其绿色主义者。还有不在这个名单上的，或者是上面这些主义的独特组合。

有的安那其受到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但没有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或克鲁泡特金主义者遵循特定的学说或路线。因此，对批评家来说，安那其主义是一个移动的目标。攻击某个特定的理论或政策，别的安那其也不会受到伤害。如果剖析某个特定的经典思想家，其他安那其就会否认他。

然而，尽管有这种困难，但某些一般的想法和态度是所有或者至少大多数安那其所共有的，它们可以作为批评的出发点。其中最重要的是：a）敌视一切形式国家，包括革命国家；b）敌视一切形式的领导，包括革命领导；c）敌视所有政党，包括革命党；d）个人主义倾向。我会一个一个进行批判。

国家

安那其（无治）的字面含义是“无规则”，反对国家和政府——不仅仅是针对特定的国家或特定的政府，而且反对所有国家和所有政府，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是安那其主义的决定性特征。

安那其主义坚持认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即对整个社会行使法律和物质权力的男女组成的特殊机构的存在，是压迫性的，与真正的人类自由不相容。为了结束压迫和建立自由，国家统治必须被不存在任何压倒一切的中央权威的自治社会的统治所取代。

按照由来已久的古老的智慧，这种“无父无君”的看法是灾难性的，或者是不可能的。灾难性，是因为没有国家，社会将陷入一场混乱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谓的“丛林法则”将占上风，人的生命将是“肮脏、短暂和野蛮的”（正如17世纪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曾经说过的）；不可能，是因为“人性”使某些个人或群体不可避免地会上升到顶峰，并将自己确立为统治者。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寄希望于选举政府并维护某些民主权利（言论自由等）使国家变得民主。

然而，传统观点是错误的，安那其主义是正确的。人类学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证明人类可以在没有国家和政府的社会中生活，而且这种社会远非混乱，还比我们现在的社会更有秩序。人类学家已经见证和研究了许多这样的ancephalous（没有首领的）社会——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非洲南部的贡桑或卡拉哈里·布什曼——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一万到五千年前，没有国家的状态才是人类社会持续了千百万年的正常状态，直到五到十千年前农业、牧业和私有财产的出现，社会被划分为不同阶级。

在认为一切形式的国家都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压迫时，安那其主义也是正确的。议会民主的出现并不能改变这一点。议员无论如何当选，都不掌握实权，而真正权力仍然掌握在国家常任官员（将军、警察局长、法官、公务员等）、银行家和大企业手中，他们利用这种权力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普通民众的利益服务。

但是，如果一个无国家的社会是可能的和可取的，那么该如何摆脱现有的国家呢？正是在处理这一关键问题时，安那其主义开始陷入麻烦。

我必须说，有些安那其甚至不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仅仅满足于对国家权威的抗拒，认为这是纯粹的个人态度，并认为没有必要为废除国家权力制定一个连贯的战略。但是，这种姿态只是要让国家可以自由地永久地继续压迫人民群众，只是自取灭亡，因为任何个人或小组最终都无法抵抗国家的力量。

一些安那其试图通过农村甚至城内的小自治社区来逃避国家的权威。不幸的是，安那其公社所遭受的困难与罗伯特·欧文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在一百五十多年前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公社相同：a) 这只是在少数人中实践的主张；b) 少数群体仍然受到更广大的社会的所有压力，迟早（通常是早）会屈服于他们。

不过，安那其对这个问题最激进和最严肃的答案是，国家将被革命摧毁，即通过群众起义，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直接行动将粉碎和瓦解现有的国家的核心机构——武装部队，警察，法院，监狱等。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绝对正确的——列宁在他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国家与革命》中来确切地讨论，革命的本质是国家机器的粉碎（而不是让社民和改革派接管现有国家）。此外，它的优势是作为一个真正在历史上发生过的过程，首先是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然后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而每一场伟大的民众革命，无论是1918-1923年的德国革命，还是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还是1979年的伊朗革命，都显示出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

然而，旧机器粉碎的同时立即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要用来取代它？在这一点上，安那其主义往往非常模糊，但与安那其主义原则相一致的唯一答案是，旧国家必须立即被一个没有政府以及中央权力的自治社区所取代。在这里，安那其主义的立场失去了所有的可信度。像马克思主义所断言的那样，社会主义一旦在国际上确立地位，阶级斗争消失，生产一旦达到人人有生活必需品的水平，为集体利益而劳动的习惯成为第二本性，那么国家就会失去功能，逐渐消亡。这与安那其提出的，在革命的过程中，当革命的胜利悬于一线时，革命阶级应该立即放弃一切权力，完全是两回事。

这将是灾难性的，有两个根本原因。第一，没有考虑到旧统治阶级不可避免的抵抗。阶级斗争不会随着起义的成功而停止。**每一次**革命的历史都表明，旧统治阶级不仅会不惜一切代价保留它所拥有的权力，而且会试图用尽一切手段夺回它失去的权力。鉴于同时进行的国际革命的可能性，也必须铭记，被剥夺财产的资产阶级将会依靠国外政府和反动势力的支持。

一场成功的革命必须考虑面对一切，从官僚主义的不合作和经济破坏到武装抵抗、恐怖主义、内战和境外势力军事干预。革命群

众在没有工人民兵或军队的协助下，在没有任何形式的法律制度来确保人民的意愿得到尊重的情况下，在没有中央决策和权威制度的情况下，在没有建立革命形式的国家权力的情况下，能抵御这种反革命活动吗？不，不能。

有许多历史先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让我们假设一个例子。让我们假设法国发生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遭遇了以马赛为根据地的右翼叛乱，再加上德国和美国政府支持的右翼势力侵入东北部。为了自卫，革命必须决定应该在东北部集中哪些力量，应该向马赛派遣什么部队，以及如何支持和武装他们。这只能是一个国家政府作出的、国家的决定。不能协调这些决定只会导致失败。

革命国家之所以重要，第二个原因是要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虽然在基层自发的工厂的占领、工人对工业的控制、建立分销合作社等方面将完成大量的工作，但在这个早期阶段，国家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考虑谁来占有从资本家没收的产业和工厂的问题。如果这些企业不是由新的国家所有，而是由各个独立企业的工人拥有，这不仅会妨碍合作和规划，而且还会导致不同工作场所之间的竞争，从而分裂工人阶级，而这正是工人阶级最需要团结的时候。

或者以铁路为例。138年前，弗雷德里希·恩格斯曾反对安那其主义。他写道：

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弗·恩格斯，《论权威》，187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2/10/authority.htm> ^[5]

这些论点在目前显然是仍然适用的。伦敦、曼彻斯特、纽卡斯尔、汉堡、柏林和慕尼黑，每个地方的工人都可以各自投入大量精

力，但当涉及到时间安排或建设新生产线时，必须有一些全面的协调和权威。想想飞机的调度，对权威的需求就变得更加清晰和迫切了。

你不能说这些产业就会简简单单地变成整个社会的财产。在以后的阶段，当然会出现一个全世界连成整体的真正的社区，但在革命中，“社区”被分为对立的、交战的阶级和派别，因此，革命社区、工人阶级绝对有必要建立体现其利益的机构。

或者考虑一下失业者、病人和其他目前还靠国家福利生活的人。在一个完全发达的社会主义（或安那其主义）社会中，将不会再有失业，产品将按需分配，但在革命之后，数以百万计的依赖国家福利的人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除非有人替他们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否则他们必将挨饿。福利是从工薪阶层征收的税中支付的，因此，必须有一个有权在革命后的几周和几个月内征税的权威。因此，必须有一个国家。

这里安那其主义的弱点是，它常常有一个浪漫的革命观念，在“伟大的一天”之后，层层困难都可以仅仅通过善意来解决。在一场革命中，数百万劳动人民共同行动起来，改变社会，并在这个过程中改变自己——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的意识，他们作为集体的一部分的意识，正在改变并极大地扩大。没有这些变化，新社会就无法建立。但是，转型的过程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的，甚至有可能不会发生，原因很简单，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所有阶层都会以同样的程度参与斗争，有些部分可能会完全绕过这些斗争。组成中下层阶级的数百万人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因此，在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将有一部分人因其总体观念或因某些特殊情况对革命的担忧，仍然受到旧思想的影响，追随旧统治阶级的领导。这些人有时必须接受多数决定，法律成为必要的，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工人国家。

原则上，这与罢工工人组织人墙以防止自己队伍中的少数人被打是一样的。归根结底，工人国家只是一条人墙，只不过提升到了尽可能高的水平。

然而，一些安那其会争辩说，当你允许一个国家存在时，也就意味着被权力腐蚀的特权精英，这将很快演变成一个新的暴政。但这忽

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阶级一再表明了其建立革命权力机关的能力，这些机关在形式和内容上与旧资产阶级国家完全不同，既民主又平等。

1871年巴黎公社确立了所有公职人员应由选举产生、应可以被罢免并应支付与工人同等工资的原则。这极大地抑制了野心家的参与，并有助于防止当选代表的利益与其所代表的利益分离。苏维埃或者说，工人委员会于1905年革命时首次出现在圣彼得堡（“苏维埃”只是俄语中议会的意思），然后于1917年传遍俄罗斯全境，通过从工作场所选出代表，进一步推进了这一阶段。使代表对他们为之进行民主讨论和辩论的集体负责，进一步加强了底层对局面的控制因素。

议会选区是一个较大的地理区域，这里的选民不能控制或罢免其议员，即使他违背其所有的选举承诺或完全改变其政治效忠，因为选民是一个原子化的个人的集合，谁也没见过谁，所以不能形成集体意志或作出集体决定。2010年英国大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数以百万计的人投票支持自由民主党，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将托利党拒之门外，结果却只能看着自由民主党与大卫·卡梅伦的托利党组成联合政府，对福利国家发动了大规模攻击。但是在接下来的四年内，选民对政府中除了议会外的任何动作都无能为力，而到四年以后，一切都已经晚了。而由于工人委员会是根据工作场所的选举建立的，所有需要集体做出的决定都是通过召开工作场所会议并召回代表。

有时有人反驳说这样的制度是不民主的，因为它会排斥那些不在工作场所的人——失业者、养老金领取者、家庭佣工等。但并非如此。只要工人委员会以工人集体权力集中的工作场所为**基础**，就没有理由不包括失业工人协会、养恤金领取者协会、租户和居民团体等的代表。事实上，除了剥削者和法西斯分子之外，人民的每一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得到代表。此外，工人委员会可能包含若干不同的政党或团体的成员，代表劳动人民中不同的趋势和意见。这种议会根本不是一党国家或独裁政权的配方。相反，它们将比任何议会制度更加民主，促进普通工人阶级的参与。

俄式的革命工人委员会一直出现在各种革命中，1918-19年德国革命、1920年意大利革命、1956年匈牙利革命，以萌芽形式出现在

1972年的智利、1979年的伊朗和1980年的波兰。2011年埃及革命中出现的捍卫革命人民委员会（The Popular Committees for the Defence of the Revolution）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

工人委员会不是按照预先确定的蓝图建立的，而是自发地从斗争中产生的。当工人的斗争开始挑战整个制度时，它们就成了工人阶级采用的合乎逻辑的组织形式，代表了新工人国家的核心，它将取代旧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无阶级社会过渡，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将逐渐消亡。

总得来说，国家绝不是一个永恒存在的机构，但也绝不是仅仅是一个错误或一个坏主意，不仅仅是以某种方式把自己放在人类的头脑中，把我们所有人都绑架起来，直到安那其主义赶来并解释它其实没有存在的必要。国家产生于某些经济和社会条件，首先是社会在生产水平低的基础上分裂为敌对阶级，除非这些现实条件得到改变，否则不能废除这种状况。此外，要改变这些状况，国家采取一种新的革命的形式。

领导

安那其经常宣称他们拒绝领导，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一直认为自己天生就是要指挥人的，而“领导才能”是它试图通过各种精英教育机构为后代培养的首要品质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是带有傲慢、欺凌和特权的，安那其对此作出这样的反应是正确的。

左派在劳工和工会运动中的领导也没有呈现一幅有吸引力的画面。在整个世纪里，“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一直是温和主义和攀缘附势的代名词。

生产一个这样的领袖，正常的模式是，一个活动家首先通过激进的政策和言论在基层建立起支持，然后逐渐上升到显赫的地位，并一点一点地放弃原则，直到他或她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精英中的一员，穿着漂亮的西装，坐着司机开的车，高薪，商务关系还有其他无数的好处，完全变成了他们本来打算改变的体制的俘虏。

工会领袖也差不多。从他成为官员的那一刻起，他就为了办公室的舒适而离开了车间的恶劣条件。他的工资和工时不再与他所代表的工人挂钩，他开始积累特权。他的工作是在工人和管理层之间进行调解，在这个过程中，他跟后者花了更多的时间。腐败，如果不是经济意义上的而是政治上的，或多或少是不可避免的。不久，他就会把争端和罢工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要赢得的斗争，还会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是劳动力可以被欺骗和逼迫接受的最低限度。

这种领导在政治上是灾难性的。在剧变的时刻，当大批劳动人民开始参与进来，开始把事物掌握在自己手中时，这些领导人的直接本能会是设法平息事态，恢复正常。如果这意味着背叛他们应该代表的事业，他们当然就是这样的。

1968年5月在法国发生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学生和工人组成的非同寻常的自发群众运动通过在巴黎街头的群众斗争、学生的占领和全国千万工人大罢工以及对许多工厂的占领，对戴高乐主义政权做出了挑战。“领导人”在当时主要是指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他们除了将这场潜在的革命运动的诉求缩小到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一系列适度要求，让大家尽快恢复工作之外，想不到什么更好的办法。

从这种在工人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史上一再重复的经验来看，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领导是错误的，应该废除。不幸的是，这个职位存在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领导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而这一事实也并非源于人们头脑中的错误思想，也不是源于某些个人或特定组织结构的与生俱来的邪恶，而是源于人们在事实上所具有的不同经历，因此他们的政治意识、对信仰的投入、知识、勇气等也不相同。

在每一个工作场所，每一个工会分支机构，每一个运动，总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愿意和更有能力承担必要的任务，作出主旨发言，留意联络名单，看管钱，或者最关键的是，提出一些关于政治前进道路的想法。

即使是历史没有记录到任何正式的领导或组织的最自发的暴乱、示威、罢工和起义，如果放在显微镜下，也会揭示非正式的领导时

刻和组织：在关键时刻高喊“前进”的人；那些挤到人群前面的人；第一个扔石头的人等等。

这一事实也影响到了安那其主义。无论安那其多么希望放弃领导，事实就是安那其主义运动一直有领导人。安那其主义的历史，和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主要人物的历史：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马赫诺、戈德曼、沃林、杜鲁蒂，甚至丹尼尔·孔-本迪。安那其主义运动可能认为正式地拒绝承认领导人的存在可以缓解问题，然而这反而他们增加了问题。这意味着，有些安那其主义领导人没有经过正式的选举，不能被随意罢免和受到民主控制。这意味着安那其主义运动特别容易受到自封的、自我延续的领导人，甚至媒体任命的领导人的危害（六十年代的自发主义学生运动受到这种媒体宣传的“明星”很大的影响）。令人吃惊事实的是，从历史上看，安那其主义运动往往只是通过其领导人的名字来令人熟知的。

今天，除了学者之外，谁还能说出巴枯宁运动、马赫诺运动或杜鲁蒂运动（当然，除了“Makhno Movement”，“Durutti Column”）的正式名称呢？。相比之下，共产党、第一国际、布尔什维克党甚至社会主义工人党都比较著名。

如果安那其主义不能解决自己的领导问题，那么它就更不能解决整个工人阶级的领导问题。从历史上看，这种领导权要么让社民偷去，要么拱手让给了斯大林主义——这一事实的结果就是无数的背叛和失败，从第二次国际1914年崩溃为民族主义并支持帝国主义战争，1933年向希特勒投降，到托尼·布莱尔和新工党对新自由主义、乔治·布什和伊拉克战争的热情拥护。安那其主义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些势力霸权的挑战。制作书籍、小册子、报纸、传单，甚至只是进行安那其主义的演讲，都确实实在在为对左派和工人阶级的影响力而斗争。然而，它拒绝领导，因而未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为阶级的领导权而战，它不仅不助于工人阶级从领导人手中解放，而且有助于改良主义者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把工人运动领入歧途。

用诸如“领导不重要，群众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之类的话来掩盖整个问题，当然也是行不成的。资产阶级的历史观，与其一直以来的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一致，无疑夸大了领导的作用，直到历史沦落

为国王、皇帝、将军和总统的队伍，而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可以负担得起忘记这一点的代价：“但是，领导的行动也是有作用的。”领导不能凭空进行革命，也不能通过意志力创造群众运动，实际上他们根本无法进行革命，只有群众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鉴于已经存在的群众运动和革命的大势，该运动的领导所发挥的作用可以显著影响结果，有时甚至是决定了革命的胜利或者失败。

在希特勒刚开展取得权力的年代（1929-33年），德国出现了一个群众工人运动，其指挥权被SDP（社民党）和KPD（共产党）瓜分。如果这个运动联合起来，它就有能力阻止纳粹。社民党领导人一如既往地希望避免对抗，共产党领导人则奉斯大林之命，将火力集中在社民而不是纳粹身上，这一事实阻止了团结的建立，并极大地协助了希特勒的上台。

因此，由于领导问题既不能被忽视，也不能寄希望于它自己消失，对于那些真正想要改变社会的人来说就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要求一个真正革命的领导：a）努力保持在其支持者的民主控制下；b）抵制制度腐败；c）找到办法确定斗争中正确的前进道路。安那其主义理论在这个问题上十分混乱，而它的反领导拜物教意味着它无法执行这项任务。

党

革命领导问题直接导向了革命党的问题。然而，安那其对党的思想的反对，甚至比它对国家和领导的敌意更强烈。

这依然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那些政党只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和工人党一直是压迫和剥削所谓共产主义国家数以亿计劳动人民的主要工具，这势必引起普遍的“反党”的反应。当看到社民和改良主义政党的保守、官僚主义和职业主义性质，以及一些极左可能会成立的政党中相当可笑的宗派主义时，对整个关于成立政党这种想法的广泛怀疑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事实仍然是，工人阶级革命党的建设对于进行日常阶级斗争至关重要，对未来革命的成功更是如此。

有两个简单且令人信服的理由。第一，工人阶级面对的是一个高度组织化和集中化的敌人，因而要打败它，就必须组织自己的队伍。在每一个工作场所和产业部门，工人都面对着资本的集中权力，而劳动力的组织和团结是任何成功抵抗的首要条件。那些试图在没有集体组织权力保证的情况下独自挑战老板权威的工人都只会被解雇。在整个社会层面，老板的统治受到最集中组织的组织——资产阶级国家的保护，就更是如此了。任何一个，哪怕是阶级和政治意识最少的工人都能理解对这种组织的需要。因此，那些完全拒绝组织的安那其都应当谴责自己完全脱离工人阶级。

革命党的第二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从来都不是平衡发展的。

资本主义掌握媒体，控制教育制度。教会等无数机构确保在“正常”时期，即不是大规模革命斗争的时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对大多数工人的思想产生强大的影响。

将大量工人描绘成完全被洗脑，也就是被动地接受资本主义向他们丢过去的一切——剥削、压迫、贫困、失业等等这些遭遇会向他们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是错误的，然而资产阶级思想仍在工人阶级中拥有强大的控制力。典型的工人阶级意识是源于自身经验的批判的思想与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反动思想矛盾的结合。例如，许多工人会憎恨他们的老板，并明白对富人是一条法律，对穷人则是另一条法律，但也可能会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偏见。其他工人可能是反种族主义和反性别歧视的，但仍然认为没有盈利动机工业就无法运作。在正常情况下，只有少数工人一贯反对资本主义，并始终拒绝资本主义思想。

因此，必须有一个以少数有政治意识的工人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在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的整体运动和斗争中为革命思想进行斗争。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认同组织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安那其所采取的战略——安那其工团主义战略——仍然不充分。安那其工团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工会主义思想背道而驰。它虽然至少试

图与工人阶级接触，是安那其个人主义向前迈出的一步，不过这还不够。

工会本质上是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为工资和条件讨价还价和斗争而成立的群众组织。为了有效地履行这一职能，他们接纳成员时必须尽可能广泛和包容。理想情况下，工会的队伍中将包括工作场所、行业或行业的每个工人，只有彻头彻尾的工贼^[6]、法西斯之类的除外。这意味着工会不可避免地正确地包含了大量工人，虽然他们的想法是混乱的，在许多问题上是完全反动的。

因此，在工会内以及社会其他阶层（失业者、学生、家庭主妇等）中必须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工人组织，也就是说，一个政党，为革命思想、革命战略和革命领导权而斗争。

那些认为需要组成自己独特的安那其组织来为革命思想进行协调斗争的人，实际上正在以另一个名义组成安那其主义政党。不公开承认这一点并不能使他们比别人更能避免同样在其他组织中发生的问题，而只能变成一个缺点。他们在政党问题上的混乱，以及他们对国家和领导问题的混乱，使他们既无法采取任何连贯的战略，也不能对自己组织的作用和结构有任何明确的认识。

工人阶级组织的必要性及工人内部意识的不均衡发展是一个事实，只有那些把工人阶级描绘成最光明的群体，为之涂上最不切实际的色彩的“极端革命派”，才会否认这样的事实。因此，最常见的安那其主义对这个论证的答复是，革命政党的历史表明，他们不可避免地沦为官僚主义、精英主义、威权主义和各种其他罪恶的东西。“有什么保证，”安那其问道，“你所说的政党不会走同样的路吗？”

当然，不可能有绝对的保证，因为什么都不能绝对保证革命的胜利，示威或罢工的成功，安那其主义也不能。处理这个问题的唯一明智方法，首先是确定这么多工人组织和政党堕落的原因，然后看看该怎么来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

安那其通常从领导人对权力与生俱来的饥渴或者列宁主义组织形式的固有威权主义（如民主集中制）来解释政党的堕落。第一个解释

本身就是攻击自己，因为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与生俱来的”倾向，如与尼采所相信的那种生俱来的权力意志，它会腐蚀任何协会、团体还有社会，使安那其主义本身变得不可能。第二个失败则很明显是因为官僚主义，这种堕落不仅影响了列宁主义政党，也影响了包括大量改良主义党和工会在内的所有类型的工人组织，包括安那其主义政党和工会。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者则解释了这些堕落趋势，其实是来自于资产阶级社会对从其中崛起的工人组织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在两个层次上施加。一方面，资本主义对普通工人的剥削、压迫和异化劳动使他们难以培养出控制其领导人所必需的信心和意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不断对领导人施加腐败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将他们与普通人分开。

这一解释对于解释革命运动历史上最严重的堕落情况，即布尔什维克主义向斯大林主义的转变，尤为重要。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对俄国革命的压力，以外部支持和强行掀起内战的形式，有效地摧毁了曾完成1917年革命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曾在1917年达到的那种意识和信心的高度，被战争、饥荒、流行病和经济的彻底崩溃所破坏，以至于它无法再有能力继续对社会实行健康的民主统治，领导层的官僚化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出现。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对这个官僚主义领导人（以斯大林为象征）施加压力，诱使它放弃其国际革命的方向（单凭这一点本可以挽救革命），转而按照其本身的条件与资本主义竞争，也就是说，为竞相积累资本而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

在同样的压力下，虽然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下工作，也产生了全职官员对工会的统治和议会代表对改良主义政党的统治。

那么，一个革命党如何保护自己免受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直存在的压力呢？有四项至关重要的措施。

- 1) 党必须参与劳动人民的日常斗争。正是这种关系反过来给资本主义施加了压力。相比之下，改良主义政党主要基于工人的被动性，宗派主义者根本不与工人阶级建立关系。

- 2) 党必须严格遵守革命原则。这本身将在很大程度上排除野心家和政治落后分子，他们容易受操纵。
- 3) 显然，任何物质特权都不应附加在党的职位或领导权上。
- 4) 政党结构和规则必须将民主（关于政策、选举和领导责任的充分讨论和辩论）与集中（在行动上执行多数决定的统一）结合起来。集中或纪律通常被视为一种从上而下的专制控制机制，尤其在安那其看来是如此。事实上，在革命党中，它同样是一种民主工具，因为它确保了领导人可以执行党的政策，而非民主的集中组织则是领导人“自由”无视党的政策或个人主义地完成行动。

归根结底，党与阶级斗争的唇齿相依的关系是决定性的，任何宪法结构都不能事先保证这一点。但这丝毫不改变一个政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性，而且鉴于资本主义环境不断给所有工人阶级政党施加压力，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提供了抵御这些压力的最佳手段。

拒绝一切政党，特别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安那其主义，只会有助于让工人阶级在组织性和政治上失去斗争能力。

**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在马克思主义与安那其主义之间的辩论中非常重要，我在俄国革命中讨论安那其主义时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对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般叙述，请参阅Chris Harman^[7], *Russia: How the Revolution was Lost* (1967)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harman/1967/xx/revlost.htm>和Tony Cliff,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cliff/works/1955/statecap/index.htm>*

个人、社会和阶级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与安那其主义的主要区别之一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某些程度上，这比我目前为止讨论的一切分歧更难处理。首先，这个问题必须更加抽象和哲学化；其次，它因安那其主义运动中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深刻分歧而变得复杂起来。然而，安那其个人主义一直是运动中一个足够重要的倾向，我必须处理它。我

希望那些拒绝个人主义而使用以阶级为基础的方法行动的安那其明白，这一节不是针对他们。

讨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通常被认为带有一种粗糙的反个人主义，把一切对个人的关注是谴责为“布尔乔亚”，机械地将社会和集体与个人对立起来。这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误读，这种误读当然也还是斯大林主义推动的，也是我想纠正的印象，因为我认为这可能会导致许多安那其和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远离马克思主义。

安那其个人主义可以追溯到威廉·葛德文（1756-1836年）和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年），他们两人都宣扬极端的个人主义，这种风格可以从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找到。

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无[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

而从这些昭然若揭的例子（神和人类）里，你们岂不就会领悟到利己主义者是最时行的吗？从我这方面来说，我由此取得这样一个教训：与其无私地为那些伟大的利己主义者继续效劳，还不如自己也成为利己主义者。

既然神和人类不外乎只将它们的事业置于自己的基础上；那么，我也就同样将我的事业置于我自己的基础上……

滚开吧，总之，那种不是完全属于我的事业……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我自己更重要的了！

<http://www.lsr-projekt.de/poly/enee.html#all.>

我怀疑葛德文还有施蒂纳对当今安那其主义的直接影响接近于零^[8]，但是安那其主义思想中往往有一个相当模糊而不明确的个人主义元素，值得对极端的个人主义提出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也就是“自由的”个人这个想法。他们只追求自己的目标，没有任何限制，也不管其他人。

首先应该说，这种纯粹的、不受约束的利己主义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存在过。人类现在，而且一直都是不可化简的社会，即相互依赖的社会。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狩猎采集社会里，没有国家，没有单独的政治权威，个人也绝不可以自由地做他们喜欢的事，或者只是为自己服务。狩猎是自然界强加的必要条件，是一种集体的合作活动。拒绝承认自己对该团体的义务的个人会发现自己被排除在集体之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就相当于死刑判决。除非忽视了生产领域，否则就不会考虑这些“纯粹”、“为所欲为”的自由观念，但我们是不能脱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的。因此，它往往只是把生产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假设”在某处，不知何故，我们背上的衣服，我们嘴里的食物之类的，已经提供给我们了。当然，这是一个高度精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态度。[相比之下，马克思把生产问题作为他整个历史理论的基石]。安那其个人主义者依然可以选择争辩说，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商品如此丰富的社会，以至于我或多或少地有完全的自由来决定要不要去工作，但这并不能解决代理机构、谁来创造、及如何创造这个社会的问题。

其次，从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个人主义的社会根源是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封建社会，哲学的出发点是上帝、教会和上帝制定的社会秩序。正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如笛卡尔的公理“我思故我在”这样的个人主义开始发展。在早期的现代政治哲学家中，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人的生命基本上是一场个人主义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为反安那其主义的结论提供了正当理由，即认为所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样，资产阶级新古典经济学也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即个人理性的利己主义消费者，作为其出发点。此外，虽然安那其可能希望给这种反独裁主义的个人主义一个左翼倾向，但这种个人主义思想却不乏被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使变成极右翼的、支持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基础，这绝不是偶然。

在这方面，还有必要提到十九世纪末期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他认为所有历史和人类行为（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整个宇宙）的驱动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力意志。尼采不是安那其，比起对安那其的影响，更著名的是他对包括纳粹的极右势力的影响，但他可能读过并受到施蒂纳的影响，他对二十世纪末的思想家如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后者又影响了安那其主义。此外，很显然许多安那其相信某种权力意志理论的变体，想当然地用它来解释列宁主义者、政治家、官僚之类的其他人的行为，却不用在安那其自己身上。安那其的那种，与马克思正相反的观念，认为国家原则或权威原则是阶级分化和经济不平等的创造者，这也是和与生俱来的权力意志概念非常契合的。

除了缺乏任何经验基础之外，普遍权力意志的概念基本上是一个右翼理论。它如果被用来分析整个社会（每所学校、每个医院、每所监狱、每个办公室等）的权力和权力斗争，并伴随着始终自愿选择地抵制权力，始终站在弱者一边，那么它就可以像福柯那样，笼罩上左派的光泽和左倾诉求的纱幕。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所能希望的最好的结果也只是无休止的抵抗，没有任何普遍解放的前景，因为权力斗争只会不断重新产生自己；第二，如果权力的意志是与生俱来的和普遍的，我们，还有安那其，为什么要选择站在无能为力的人一边，而不站在强权一边呢？也许并不更坏，或许还更合理？事实上，或许应该正如许多尼采人所做的那样。

那么，马克思主义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看法是什么呢？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排斥对个人自由和个人人格发展的关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资本主义的其中一点就是，尽管它鼓吹个人主义，实际上却粉碎了大多数人的个性：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并宣布他们的目标：“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的重点——JM^[9]]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8/communist-manifesto/ch02.htm>^[10]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扩展了这个观点。

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7/anti-duhring/ch25.htm>^[11].

而对于马克思来说，个人也不是孤立的唯一者，也不是与社会背道而驰的“孤岛”。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oscow 1981）中，他写道“个人是社会存在物”（第93页），并批评“粗陋的共产主义”，它只关注纯粹消极地废除私有财产，并“到处否定人的个性”（第88页），支持共产主义“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是……矛盾的真正解决……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第90页）[马克思的要点]。

然而，要达到这个“自由领域”，需要变革的推动者，一种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纪的社会力量。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变革的推动者是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正如《共产党宣言》所界定的那样，“没有自己生产资料的现代雇佣劳动者的阶级，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沦落到出卖劳动力量^[12]”。这种对工人阶级革命作用的认同——它解放自己并在这个过程中解放人类的能力——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它贯穿于这本小册子中，但此时我想就工人阶级斗争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提出两点意见。

首先，**任何**集体斗争**都**涉及对个人按自己的喜好自由行事的某些限制。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工人阶级斗争的最基本形式即罢工

中，把工作当作自己的喜好的人是工贼。但第二，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关于个人自由的经验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区别。对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的个人自由和发展是与集体对立的，对工人阶级来说，个人和自由的主要限制是他们的经济状况受到限制，这只能集体改善。因此，对大多数工人阶级来说，他们的个人的自由和发展是受保护且更进一步的，这是与集体相对立的；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他们的个性和自由的主要限制是他们受限制的经济状况，这只能通过集体加以改善。因此，对于大多数工人阶级来说，他们的个人发展取决于整个阶级的进步，例如他们个人享有更健康和更长寿的机会取决于免费医疗服务的集体成就，他们获得教育的机会取决于免费国家教育的存在等等。的确，对于许多工人来说，正是在集体奋斗中以及通过集体奋斗，他们个人的个性才能得以觉醒和绽放。一场革命涉及到数百万个这样的个人的个性的同时唤醒，而工人的社会权力的实现将意味着（如果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自由的话）个人自由与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一切自由相比的巨大扩展。

安那其主义中的一些倾向，如安那其工团主义和安那其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作用，但通常它们仅限于抽象地宣告对自由的热爱，而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通过工人阶级斗争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另一些安那其则完全否定了工人阶级的概念，从切断了与任何可能带来变革的社会力量的联系，或者会寻求它的替代品，如“大众”或“*precariat*^[13]”。后一种选择将在第4章关于自治的章节中讨论。

安那其主义的历史记录

安那其主义思想的要素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因为人类一直梦想着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但安那其主义作为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只能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

在其存在的一百六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毫无疑问，安那其主义中平等地产生了很多男女英雄，也许还产生了更多——他们既著名又无名，为革命事业奉献了一生的个人。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所发现的弱点经常在安那其主义实践中表现出来。

我们显然不可能在这里回顾安那其主义的全部历史。相反，我将只是试图通过三段安那其主义的历史说明，并从而加强已经提出的论点。19世纪70年代，巴枯宁的活动、俄罗斯革命中的安那其主义（附注安那其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安那其主义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作用。这不是要翻阅安那其主义的记录，寻找丑闻、背叛和白痴的例子——这种毫无意义的努力很容易被应用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而是研究革命斗争史上的关键时刻，这提供了安那其主义实践的一些最有意思的部分。因此，对这些部分的批判挑战安那其主义传统中最坚实的，而不是最薄弱的部分。

巴枯宁

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也许是安那其主义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当然，在他的外表，生活方式和行动的激情，他似乎是一个典型的浪漫安那其主义英雄。直接参与了许多失败的起义并当上了许多监狱的老兵，包括在圣彼得堡臭名昭著的彼得保罗要塞的五年单独监禁，这样的巴枯宁作为安那其主义创始人，比任何其他个人都更倾向于有组织的行动，有别于其他更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

他还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强度体现了安那其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所固有的矛盾。

巴枯宁在抨击马克思主义为“国家主义”和“威权主义”时，以及他的许多煽动性宣言中，把自己描绘成一切权力、权威、领导和从属关系的激进对手。因此，巴枯宁运动“国际兄弟会”的方案指出：

随着工人的和平呼喊，所有被压迫者的自由和一切形式的统治者、剥削者和监护人的死亡，我们试图摧毁所有国家和所有教会及其所有机构和法律、宗教、政治、司法、金融、警察、大学、经济和社会，使数百万受骗、奴役、折磨和剥削的人，从其所有管理者和赞助者、官方的和指手画脚的事物中解放出来，集体和个人最终能够完全自由地呼吸（巴枯宁，国际兄弟会方案，1869年）。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akunin/works/1869/program.htm>

1871年，他宣布：

总而言之，我们拒绝一切立法，一切权权威，以及一切对我们的特权，许可，官方的和法律的权力，即使它产生于普选。

1872年：

我们不接受，即使是为了革命过渡的，国民大会、制宪会议、临时政府和所谓的革命的专政。

然而，在他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巴枯宁致力于组织以完全服从自己的原则为基础的小的秘密的和等级制的阴谋。巴枯宁在给臭名昭著的俄罗斯阴谋家内恰耶夫的一封信中解释了他的方法：

其目标接近我们的社会必须被迫与我们的社会合并，或者至少必须让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服从于我们社会，而有害的人必须从社会上移走。必须解散那些不友好的和绝对有害的社会，最终必须摧毁政府。这一切不能只通过传播真理来实现：狡猾，手腕，欺骗是必要的。

<http://quod.lib.umich.edu/l/labadie/2916979.0001.001?rgn=main;view=fulltext>

巴枯宁正是试图使用这些战术赢得对国际工人协会和第一国际的控制。他和他的支持者在1869年加入国际时，宣称自己的组织——社会主义民主联盟已经解散，但实际上仍然作为一个秘密网络保持着。

1872年，巴枯宁写信给一位意大利支持者，内容如下：

我认为，你迟早会明白建立（国际）核心部分的必要性，这些核心由最可靠、最忠诚、最聪明、最有活力的成员组成，简言之，是最接近目标的成员。这些核心本身之间紧密相连，与类似的在意大利其他地区或国外的那些已组织和未组织的核心将有双重任务。首先，他们将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成为这个被称为国际

工人协会的庞大机构的振奋人心和活生生的灵魂，接下来他们将讨论一些不可能公开对待的问题……对于像你和你朋友这样聪明的男人，我想我已经说得够多了……自然，这个秘密联盟能接受进入它的行列的，只有**极少数**的个人。

宣布的原则与实际做法之间的这种矛盾不应仅仅被视为巴枯宁个人要求主宰局面的结果。事实上，巴枯宁是安那其主义拒绝领导这种内在矛盾的活生生的体现：即取代民主选举产生的可随时替换的领导的，不是领导的不存在，而是不民主、未经选举和不可替换的领导。

然而，这个秘密阴谋不仅违反了安那其主义本身的原则，而且是领导工人阶级革命的灾难性手段。任何一小群特别挑选的个人都不可能衡量或引导工人阶级的情绪：因此，阴谋直接导致了仓促起义的思想，少数人企图独立于大多数工人的行动与愿望之外发动叛乱。巴枯宁参加了几次这样的冒险，都以可悲的失败告终，包括1870年9月在里昂发生的一次，在一波民众骚乱中，他和他的支持者占领了德维尔酒店，宣布自己为拯救法国委员会，并宣布废除国家。

不幸的是，国家拒绝承认它被废除了，并迅速以国民警卫队的两个连的形式废除了巴枯宁的政变。巴枯宁被迫逃往热那亚，因而被排除在参加真正的工人革命——第二年的巴黎公社之外。

有趣的是，巴枯宁不仅将秘密权力的概念应用于革命运动的组织，也应用于后革命社会的组织。巴枯宁在给他的朋友和追随者阿尔伯特·理查德的一封信中解释了一旦建立无政府状态，他和他的支持者将如何构成一个“秘密独裁”。

作为无产阶级风暴中看不见的飞行员，我们必须指挥它，不是通过开放的权力，而是通同盟[联盟成员]的集体独裁：一个没有任何职务徽章、没有头衔、没有官方权利的独裁政权，更强大的地方在于，外人看不见它有什么权力。这是我唯一接受的独裁统治。

（《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 第三卷：无产阶级专政》，1986年纽约，第95页）

<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bakunin/works/1870/albert-richard.htm>

幸运的是，这种无形权力的愿景可以被斥为完全的幻想，因为可以想象如果它被实现，那就将成为最不民主的统治形式。

一些后来的安那其可能试图否认巴枯宁，但正如我们会看到的，巴枯宁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二十世纪的安那其主义中重新出现，即使在其“最伟大的”时刻也是如此。

俄罗斯

俄罗斯的安那其传统早于马克思主义，但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安那其主义在1917年革命中的作用是多么小。

俄国革命是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革命。1917年俄国工人和士兵达到的斗争程度和政治意识是任何工人阶级在其他任何时候都不曾达到的高度，然而安那其主义却只是勉强在这个重大运动中站稳了脚跟。

因此，沃林，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俄罗斯安那其主义知识分子，在1917年7月返回俄罗斯时，在革命的核心彼得格勒没有发现哪怕一份安那其主义报纸、一张海报、一个演讲者。在苏维埃，安那其没有值得一提的代表权，甚至在基层工厂委员会，安那其主义决议也始终输给压倒性多数的布尔什维克的决议。

造成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布尔什维克扮演的角色。一般来说，当工人运动的现有领导处于最背信弃义和令人幻灭的境地时，工人阶级各阶层之间就会出现安那其主义情绪，但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提供了明确的革命性领导，从而吸引了几乎所有工人阶级激进分子的支持。

第二，从1917年2月至10月是一个双重权力的时期，也就是说，两个敌对国家之间斗争的时期。一边是旧沙皇国家的残骸，其军队和官僚机构由新的临时政府主持；另一方面是工人和士兵自己创造的苏

维埃，他们的权力和权威一天胜过一天。关键的问题——最终是也唯一的问题——是哪个国家所代表的哪个阶级会获胜。是旧的沙皇-资产阶级国家会粉碎苏维埃和工人阶级，还是工人阶级会粉碎旧的国家，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的政治力量——克伦斯基政府、孟什维克等——都逐渐沦到对一切无能为力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如安那其主义一样原则上排斥一切国家的倾向，必然被边缘化。大多数的安那其，要么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上做出了让步，成为苏联政权的冷淡支持者，要么与安那其主义决裂，加入了布尔什维克。除次之外的人，像经验丰富的克鲁泡特金（已经因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俄罗斯、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而名誉扫地）被看作和越来越令人厌恶的临时政府一样的人。

事实上，直到随后的十月革命和紧随其后内战以后，安那其主义才得以在事情中发挥独立的重要作用。内战是革命的艰难时期，也是俄罗斯人民遭受巨大苦难的时期。革命被围困了。白军，由最反动的沙皇将军领导，以国际资本主义所有势力的资金、武器和军队为后盾，令彼得格勒和新生工人国家悬于一线。世界大战的浩劫、1917年的经济危机、革命本身不可避免的破坏以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损失，而内战不仅直接造成了可怕的大量死亡，也使苏联经济彻底崩溃。工业停滞不前，交通系统崩溃，没有燃料可以加热城市，工人被迫回到农村寻找食物，霍乱和斑疹伤寒的流行肆虐。

但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坚持了下来并取得了胜利，这一事实证明了他们在俄国工人阶级中赢得了深刻的支持。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安那其主义也能够工人阶级的各阶层中获得听众，更能够听取农民的支持，他们因遭受的这些艰难困苦而幻灭。

农民的不满情绪尤其普遍。1917年，农民从他们常年的压迫者，也就是地主手中夺回了土地，布尔什维克也赞同这一点，从而将农村的农民起义同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但在内战期间，工人国家不得不动用武器从农民中征用粮食。对此别无选择——唯一的选择是城市大规模饥饿和革命的彻底失败——但这不可避免地疏远了农民。虽然战争处于激烈的时期，地主返乡的直接威胁确保了广大农民对苏俄的忠诚，但随着战争接近尾声，农民的愤怒沸腾了。这引起了

两个安那其一直以来声称与安那其主义有关的，具有历史重要性的现象——马赫诺运动和喀琅施塔得起义。内斯托尔·马赫诺是一位年轻的乌克兰安那其，他身边聚集着一支农民军队，先是与白军作战，然后是红军，他们以极大的胆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直到内战结束时最终被红军镇压。

喀琅施塔得是一个岛屿海军基地，控制着彼得格勒的所有海上通道，其水手在1917年革命中发挥了主导作用。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发动武装叛乱，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要求停止粮食征用并终结“没有共产党人的苏维埃”。由于担心起义可能导致刚结束的内战重新爆发，布尔什维克的红军无情地迈过冰冻的海面，给该岛带去一场狂暴的腥风血雨。

马赫诺运动和喀琅施塔得都被安那其主义神话化为被布尔什维克极权主义镇压的人民真正的自由革命的表达。然而，现实却大不相同。

马赫诺可能喜欢盛大的安那其主义宣言，但在实践中，他是一个专制的农民领袖和军事指挥官，任意处决他的对手（尤其是共产党人）和疯狂的醉酒狂欢。也许对马赫诺及其运动的真实本质最能说明问题的判断是由极具同情心的历史学家乔治·伍德科克在他的经典著作《安那其主义——自由主义思想史和运动史》中宣布的：

从本质上看，他既是一个乡下人，又是一个地方主义者：他憎恨城市和城市文明，他渴望“自然的简单”，渴望回到一个像过去农民传说一样，“自由劳作者”“按照自由而欢快的歌曲的曲调工作”的时代。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后来的阶段，当马赫诺人占领了一些相当大的城镇时，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直面过组织工业的问题，也从只能获得几个城市工人的忠诚。

但还有另一个因素——革命起义军。从理论上讲，这是由农民、工人和叛乱分子代表的大会控制的，但在实践中，它是由马赫诺和他的指挥官统治的，而且像所有军队一样，只有名义上是自由的。它使用自己的征兵形式，并遵守粗暴的纪律，这毫无疑问，马赫诺是主人，往往涉及迅速和暴力的惩罚……他的放荡是

卡拉马佐夫式的：甚至他的崇拜者沃林也承认了这一点。（乔治·伍德科克，《安那其主义》，伦敦1975年，第396-7页）

安那其沃林抱怨道：

在酒精的影响下，马赫诺……失去了自己的控制。然后是往往得到暴力支持的个人的任性，突然取代了他的革命责任感；这是专制，是荒谬的恶作剧，是独裁的滑稽动作，一个战士首领……这导致了马赫诺军事集团或者说密党的形成。（沃林《格伍德科克行动》第397页）

与马赫诺一样，喀琅施塔得起义也采用自由的口号，如呼吁进行“第三次革命”，这引起了安那其的支持，但它也植根于农民对战争共产主义的征粮政策的反对。喀琅施塔得1921年的驻军不是1917年的驻军。1917年的老兵要么已经死了，要么被调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农村的新兵，他们中的许多人，如第160步枪团的2500名乌克兰人，来自对马赫诺特别友好的地区。

但农民不是能够领导俄国革命前进的社会力量。与小农场形状的私有财产为盟，生产方式的个人主义，在地理和经济上与城市生产的决定性力量的隔绝，及其物质生活条件使农民运动无法全国在全国范围内代替布尔什维克的权力（更不用说国际）。

现代社会不能通过农村统治或组织。因此，无论如何，农民都只能被迫屈从于这一种或那另一种主要城市阶级，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这一一般真理对俄罗斯的局势具有特别的效力。农民起义是直接针对沙皇主义和地主的，这种农民运动与城市工人运动结盟是极其进步的。针对城市工人的权力，甚至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工人权力的残余，这不可避免的是反动的。不管它举起的旗帜是红色、绿色还是安那其主义的黑色，旨在粉碎“共产主义独裁”的农民起义只能打开资产阶级或沙皇复辟的大门。

喀琅施塔得起义发生在彼得格勒的入口处，如果它胜利了，甚至就算只是存活了较长一段时间，都给刚刚击败的白军一个重开内战的黄金机会。白军完全理解这一点，并全心全力地向喀琅施塔得提供粮食援助，同时制定计划，准备在起义成功后派遣部队。

俄国和外国安那其联合起来支持喀琅施塔得，这只能说明他们对自己的阶级效忠十分糊涂，无法用阶级术语来分析局势，被他们无国家、无权力的革命乌托邦理论蒙蔽了现实。

因此，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中安那其主义的资产负债表表明，当革命推进时，它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当革命衰退时，它却给反革命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帮助，尽管他们并不打算这样如此，它还是给予了真正的帮助。

关于安那其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的说明

这本小册子是马克思主义对安那其主义的批评，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辩护。然而，安那其主义意识形态的要素之一一直是批评马克思主义为专制的，而这一论点的核心是批评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初期的行为。革命社会主义者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一时期普遍为布尔什维克的历史辩护，这是马克思主义—安那其主义辩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空间的考虑使得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充分处理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对这段时期最好的描述和分析是在托尼·克里夫，《列宁》，第3卷，《革命围攻》，伦敦1987年），但评论的主要问题是必要的。

安那其主义论点的实质如下：

1. 1917年10月的革命是布尔什维克的政变，而不是真正的工人革命。
2. 布尔什维克没有建立无产阶级（工人政权）的专政统治，而是建立了自己**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统治——他们有系统地将权

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废除了工人对工厂的控制，镇压了所有反对派（如马赫诺和喀琅施塔得），并建立了一党制国家。

3. 这样，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随后的可怕的斯大林政权奠定了基础。列宁主义曾经，并将再次导致斯大林主义。

关于这一观点，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它与罗伯特·瑟维斯等许多其他主流资产阶级和右翼关于革命提出的学术说法几乎完全吻合。虽然这本身并不能反驳它——毕竟我也可以同意大卫·卡梅伦二加二等于四的观点——但在这样一个高度紧张的政治问题上，它应该可以让安那其停下来冷静思考。

人们相信1917年10月的事件仅仅是一场政变，还是因为从彼得格勒夺取权力用到了几千名赤卫队，并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但这忽视了广大工人群众对行动的极大支持，包括布尔什维克此时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中占多数的事实，令人吃惊地错过了重点。之所以单凭几千名赤卫队就能够占领冬宫并逮捕政府而不立即受到国家军队的镇压，是因为大批士兵、水手和工人已经站在了革命的一边，使得克伦斯基政府找不到人来保卫自己。任何怀疑这一点的人都应该试着想象，如果明天一个革命党（如社会主义工人党）带着几千名成员，试图在议会或白金汉宫游行并夺取它，会发生什么。

关于布尔什维克掌权行为的争论是片面的，但也有一些道理，因为他们确实采取了镇压性的行为，例如禁止反对党。然而，它忽略了前因后果，造成了一个与马克思主义者巨大的不同。如果我跟你讲一个著名的革命者和自称“人民之友”的人在近距离射穿了一个女人的胸口，那听起来很糟糕。如果我们知道那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马拉，而他射杀的女人是夏洛特·科黛这个正要用刀刺进他的心脏的反革命，那感觉将大不一样。[不幸的是，马拉没有枪，被暗杀了]。

布尔什维克的威权主义不是受教义或天生的倾向制约的，而是他们所认识到的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们真正为自己的生命和革命的生死而战的令人绝望的内战环境。此外，必须认识到，内战也彻底破坏了俄国的经济，造成了生产灾难性的下滑，而且这也破坏了革命的社会基础，即革命的工业工人阶级。这确实确实使得布尔什维克停滞在革命这个飞跃的半空中，并被迫以独裁的方式行事，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犯错误。

安那其主义的论点也没有考虑到选择另一条道路的后果。1920-21年摆在俄国人面前的确切可能的道路是什么？一种可能性，太真实了，就是白卫兵反革命的胜利。毫无疑问，这将意味着对工人、农民和革命者最可怕的屠杀并产生某种俄国特色的纳粹主义。另一个具体的可能性是布尔什维克独裁政权。当时的俄国人民有可能指望一个健康、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吗？不，绝不可能。也不可能会是一个今天的英国（la Britain）或法国这样“正常”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尖锐的矛盾、绝望的贫困和饥荒排除了这两种选择。安那其主义革命和迅速建立安那其主义社会是可能的吗？绝对不行！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包括崇尚自由的维克多·塞尔日^[14]等人物，选择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并接受它的缺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可以说，布尔什维克专政也像白军胜利一样导致了1928年以后斯大林统治下“对工人、农民和革命者最可怕的屠杀”，但是时间的间隔很重要。对于俄国革命来说，打破僵局的唯一出路就是将革命传播到国际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战略是掌权，希望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一旦国际革命受挫，首先是在1923年的德国，情况就急转直下导致彻底吹响了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号角。但这并不意味着列宁的战略是错误的，特别是因为在意大利、德国和其他地方的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布尔什维克式革命政党的缺席。

将1917-23年的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三十年代的斯大林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混为一谈，就是把一场被围困而扭曲的革命与反革命混为一谈。现如今，由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工人革命，在经济发展、工人阶级规模和向国际传播的机会方面，将处于更加有利的境地。它将能够遵循列宁本人在1917年设想的道路，即在健康的多党苏维埃民主政体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事实上，工人阶级将有能力确保这样。

西班牙

如果说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革命，那么1936-37年的西班牙革命就是它在历史意义上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之一。此外，这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安那其主义参与并得到大众支持的革命性动乱。事实上，到1936年，安那其主义工会联合会（CNT）已经有了100万会员，

这是它迄今为止在工人阶级中最大的发展趋势。因此，西班牙革命可以被正当地视为安那其主义的试金石——这次考验的失败并不是安那其主义工人本身的问题，他们已经展现了无上的勇气和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而是安那其主义作为革命策略的内在缺陷。

西班牙革命始于1936年7月，以答复佛朗哥将军反对新当选的人民阵线政府（共产党、社会党、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法西斯暴动。

尽管政府瘫痪，但西班牙工人，主要是受鼓舞的安那其，奋起阻止法西斯主义。武装的工人包围了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军营，呼吁士兵们起来对抗他们的长官。经过一天的战斗，巴塞罗那军营被拿下了，第二天在马德里也同样取得了胜利。几天之内，工人们就完全控制了城市。工人委员会兴起，组织运输、食品供应、民兵和医疗保健。他们派出武装纵队到农村去保护粮食，支持农业工人的行动。通过集体组织社会的运行使每个人都摆脱了压在身上数十年的剥削和压迫。例如，在巴塞罗那，妇女的地位超越了世界上任何国家，堕胎合法化、提供节育信息、新式的自由婚姻使得胁迫和拒绝离婚不再发生。正如当时的作家乔治·奥威尔所言：

最重要的是，人们相信革命与未来，以及一种突然进入平等和自由时代的感觉。人类终于可以尝试表现为人，而不是资产阶级机器中的鸡。（乔·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伦敦1984年，第10页）

成功的工人革命潜力巨大，但法西斯的威胁依然存在——佛朗哥在西班牙西南部成功地建立了控制权，另一个法西斯分子莫拉将军正从北方袭来——共和党政府也是威胁，它至少在名义上仍然掌权，在加泰罗尼亚（革命的中心）和马德里也是如此。

那么安那其主义领导人做了什么呢？（请再次注意安那其主义领导人在实践中的存在）。他们先于1936年9月在加泰罗尼亚加入了政府，后于12月在马德里加入了政府。这一行动不仅背离了安那其主义原则，而且更悲剧的是这种行为意味着对工人阶级和革命的背叛。安那其主义领导人进入的人民阵线政府致力于保护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并试图恢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权威。其路线

是在反对佛朗哥的斗争中联合不同阶级中的所有民主力量，而工人阶级所要求的社会根本变革却应当被搁置到法西斯被打败之后。

政府中资产阶级代表的这一立场表明，对他们来说，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说到底还是没有工人阶级的胜利更邪恶。因此，除非他们的私有财产得到保障，他们才会与左派合作。至于社会党，表示愿意与布尔乔亚长期合作。

对共产党来说，与资产阶级合作则是莫斯科强加的政策，以免惊动作为斯大林反对希特勒的盟友的法国和英国政府。

因此，安那其主义领导人加入了一个以镇压西班牙工人阶级大规模起义为己任的政府，并接受了它所赋予的责任。这也意味着他们接受了这样一项战略的责任，它远没有它所声称的那样加强与佛朗哥的斗争，这实际上注定了这场斗争的失败。

如果这场反法西斯战争只是作为一项常规的军事行动进行的，那么佛朗哥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战争机器的支持下，最终总是会获胜的。反法西斯势力取得胜利的途径是将这场战争转变为一场革命，让大众的活力和主动权自由支配，通过行动和言辞呼吁法西斯所控制的领土上的工人和农民，并通过使殖民地独立来破坏佛朗哥在摩洛哥的基地（他就在这里发动的政变）。人民阵线政府反对这场人民战争，还得到了安那其主义领导人的协助，而安那其主义领导人是最能引导西班牙工人运动趋势的人。

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安那其主义领导人会以这种方式行事？是纯粹的个人偶然现象，还是安那其主义固有的弱点的结果？答案由CNT领导人自己提供，他们在试图为自己辩护时提到了局势的特殊性质（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并解释说：

我们要么合作，要么使对我们自己独裁加重……没有什么比用武力逼迫更远离安那其主义了……

我们没有夺取权力，不是因为我们无法夺取权力，而是因为我们不想夺取权力，因为我们反对各种独裁统治。

换句话说，形势是绝望的，反革命已经兵临城下，必须通过领袖，协调和权力才能抵制它。这种权力可以是现有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可以是工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由于安那其拒绝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与资产阶级国家捆绑在一起。

这里有一个铁一般的规律，它不仅限于1936年的西班牙，而且它也不但已经，并将依然适用于每一个严肃的革命局势。反革命永远就在门外，真正的选择永远只有资产阶级的权力和工人的权力两种；拒绝无产阶级的专政统治总是意味着在决定性的时刻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因此，西班牙革命的失败，即安那其主义作为群众运动所达到过的最高点，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反常的。相反，它触及了安那其主义的核心，表明它作为革命行动指南的致命缺陷。

今天的安那其主义——一些当前问题

和过去一样，今天的安那其主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可以说令人费解。我无意进行难免不充分的调查或概述，只是想要研究两种趋势——即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

（Lifestyle Anarchism）和自治主义，这两种趋势近年来一直很重要，代表了运动中的两极对立面——而是增加了一个关于“安那其纲领主义”的说明，然后继续评论马克思主义者和安那其往往有着不同意见的一些关键的战术问题，即直接行动、参与选举和民主决策。

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

我所说的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是指一种无定形的意识形态——没有明确的信条——它提倡并赞美按照“安那其主义原则”在资本主义中生活或尝试在其中生活。通常是选择不从事有偿工作，并尝试或多或少的集体生活，通常非法居住，在这里，“正常”的规则和等级制度都不适用了。有时，这被当作是生活在制度“外面”，但由于这个制度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外面”，它更准确地说是生活在制度内的飞地里，或者借用约翰霍洛威使用的术语，在其“裂缝”里。这些飞地通常存在于内城的低成本住房地区，如伦敦的哈克尼（Hackney）或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但有时在农村地区也可以建立这样的小社区。除了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之外，也有一系列文化追求——表演艺术，包括歌舞表演、小丑和其他马戏技巧、当代视觉艺术、音乐等——食尚（素食主义等）、信仰异教和各种形式的“新时代神秘主义”。

虽然就其本质而言，安那其主义排除了任何共同的路线、政策、战略或政治哲学，但有时这个社区或其内部的一些要素确实参与了集体行动、示威、运动等，包括与国家的对抗。

美国资深作家、活动家默里·布钦（Murray Bookchin）从更接近社会主义的社会安那其主义的角度对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进行了详细的批判。他的著作‘Social Anarchism or Lifestyle Anarchism : the unbridgeable chasm’ (AK Press, Edinburgh, 1995)详细论述了各种理论和“大师”，这些主要是非理性主义和反科学的劝说，然后在这种社会

环境中流行起来并谴责整个社会现象为小资产阶级和“美味的安全”。但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这些论点，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对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有两个非常简单和直接的批评。

第一，它对如何改变世界没有提供战略或观点，事实上，它甚至没有认真尝试提供这种战略。如何战胜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而不是逃避，这个问题甚至很少被提出来，更不用说回答了。这些人最希望的就是，安那其主义的生活方式会被证明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每个人或至少大多数人迟早会效仿。我们绝对不会清楚是不是所有人都会相信这种观点，但无论如何也得说，这完全不是一个好的开始。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我是说统治阶级和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中上层阶级（高级管理人员、国家高级官员等），他们不可能采纳安那其主义的生活方式或意识形态，而不幸的是，他们正是这个社会控制财富和权力的人。同样，虽然原因不尽相同，广大工人阶级也不可能接受他们。大多数工人阶级成员不喜欢雇佣劳动——这是异化劳动，即使他们不使用这个讨厌的词，他们也会憎恨它；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失业是个更加严重的灾难，会使自己和家人陷入悲惨的贫困，使他们感到自己毫无价值。事实证明，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允许，失业人数就会减少到非常低的水平。

此外，应该说，工人的本能无论是从政治权力的角度还是从整体社会的角度都是正确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他们的抵抗能力，不仅源自他们的人数，而且源自他们在生产场所、工会和最终在工人委员会中组织起来损害老板利润，并最终完全控制生产的能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失业削弱了工人作为个人和集体的力量。

安那其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一般性的，因为事实上，它以千种方式依赖于生产性有偿劳动——不论是每个安那其的非法居住还是使用电话、手机、电脑、汽车、公交、火车、自行车、燃气、电力、自来水、金属餐具和无数其他人工制品的公社，都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有关（它现在已经高度全球化了），可以接管，但不能以任何有显著可能的方式选择退出。

这直接引向了对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的第二个主要批评，也就是即使少数人选择了这种方式（也许可以作为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安

那其的生活方式也只有对于极少数个人可以永久可持续。

安那其，像社会主义者和这个社会的其他人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并在资本主义下被社会化，不断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如果他们有孩子（他们也受到社会和同龄人的压迫），压力只会加剧而不会减弱。这些压力不可避免地影响和破坏安那其主义社区内个人的忠诚和整个社区的原则。如果社区成员经常从事或成为各种小型自营职业者或创业活动，情况将尤其如此。因此，一般的情况是，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只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边缘的少数人生活中的一个暂时的情况。

自治主义

自治主义是一种政治趋势和观点，在国际反资本主义运动（又名反全球化运动、另类全球化运动）中具有影响力，该运动通常可以追溯到著名的西雅图反对全球化的示威游行。

贸易组织那几年的一系列会议，从在1999年11月开始，达到了2001年热那亚七月大示威^[15]和2002年9月在佛罗伦萨举行的欧洲社会论坛^[16]这样的高度。自治主义有时被视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潮，因为它的理论根源就来自它的主要思想家马里奥·特龙蒂和托尼·内格里，首先在意大利共产党（PCI）中提出，然后于六十年代末在Potere Operaio（工人权力）这个极左派团体中传播。然而，就其实际理论和实践而言，自治主义比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或列宁、托洛茨基和卢森堡）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更接近安那其主义。

起初，在六十年代，自治主义（当时称为“工人主义”）侧重于生产场所激进的产业工人的斗争，特别是意大利北部汽车厂工人的斗争。这与意大利共产党及其相关工会领导人的议会改良主义和妥协形成鲜明对比，与一般政治、政党和工会斗争背道而驰。特龙蒂和内格里制定了所谓的“拒绝战略”，不仅赞美非官方罢工，而且还赞美破坏和旷工，这些罢工被视为工人阶级“自主”地拒绝与资本合作，从而破坏资本。

后来，在意大利工人运动在七十年代遭到打击，意大利革命左派普遍处于交战的危机之后，内格里将注意力从生产点的工业工人转移

到他所谓的“社会化工人”身上，重点是失业者和其他“边缘化”分子。然后，在意大利政府监禁他之后（以与红色旅^[17]有牵连的罪名虚假指控），他和迈克尔·哈特一起出版了两本书，*Empire* (2000)和*Multitude* (2004)，在激进派圈子中享有相当大的成功和影响。在这里，我想研究一下内格里提出的两个观点，借此也会研究到许多认为自己是自治主义者或安那其的人，这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对左派和反资本主义运动还具有最广泛的危害。

首先，认为拒绝雇佣劳动是一种革命性行为的观点。我已经在批判生活方式安那其主义时反驳了这种观点，但正是因为内格里和自治主义者是激进分子，他们把这个观点推到了极端，这是完全灾难性的。他们不仅开始关注失业者，而且开始将有工资的工人视为体制的合作者。内格里写道：

一些工人团体，一些工人阶级，仍然局限于工资的次元中……换句话说，他们就像依靠税收一样靠收入的工资生活。因此，他们盗取和征用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他们参与社会劳动——与管理层存在的条件相同。这些立场——以及促进这些立场的工会做法——我们将在必要时通过暴力进行斗争。这已经不是失业者进军进入大工厂了，这样他们就能摧毁傲慢的受薪者。

（Red Notes eds. *Working Class Autonomy and the Crisis*, London 1979, p.110）

这种由年轻激进分子所践行的观念，确实为老板分裂工人阶级做了贡献，导致准革命者和工联主义者大打出手，在就业者和失业者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而不是像革命者、社会主义者，甚至安那其应该做的，为工人阶级的团结而奋斗。

其次，内格里和哈特从发动社会化工人的想法转向“大众”的概念（与“工人阶级”的概念对立）。大众是一个模糊的术语，指的是几乎每个不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类似于旧术语“人民”。乍一看，这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社会主义者和安那其总是鼓动“人民”，而且许多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一些社会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定义过于**狭隘**，认为工人阶级只是体力劳动者，而不是所有靠出售劳动力为生的人，其效果是排斥白领工人，使工人阶级在现代社会中看起来是一个衰落的阶级。

然而，“大众”的概念是致命的缺陷。它所忽视的，事实上是它所积极掩盖的，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无数的受害者中，有一个具有挑战和推翻现存制度的独特能力的特殊阶级，即国际工人阶级。以这种方式区别出工人阶级是一种战略判断，而不是道德判断。这并不是基于工人比其他人“更好”的信念，也不是因为工人都有社会主义意识，或者对劳工运动的过去有感情上的依恋，而是基于他们作为资本家最主要的利润源泉（或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的经济地位，基于他们与社会生产的关键力量的联系，以及他们在大型工作场所和城市集中。

工人阶级的中心作用在埃及革命中再次得到体现。埃及群众示威，占领广场和街道，与数百万警察作战，此时穆巴拉克依然继续掌权。但是，当2月10日至11日的规模宏大的示威游行辅之以工人在生产场所集体行动的大罢工浪潮时，以前忠于穆巴拉克的将军们决定，他们必须牺牲这个独裁者来挽救体制。

工人阶级自在工业革命中诞生以来，一直是左派、社会主义者、安那其、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出发点、社会基础和战略锚地。切断自己的锚链的自治主义所设置的战略漫无目的，战术漏洞百出。

这同样适用于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最近阐述的“precariat”的概念。根据斯坦丁，precariat是“新的危险阶级”，他创造这个词与“无产阶级——20世纪社会民主所建立的工业工人阶级”相对：

它包括许多没有安全感的人，过着零碎的生活，不稳定的短期工作，没有职业发展的简历，包括数百万受挫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他们不喜欢他们面前看到的东西，被压迫性劳动虐待数百万妇女的，被打上越来越多的终身的犯罪标签，被归类为“残疾人”数百万人，和世界各地数以亿计的移民。

<http://www.policynetwork.net/articles/4004/-The-Precariat-%E2%80%93-The-new-dangerous-class>

斯坦丁声称（虚假的）关于埃及革命以及最近在西班牙和希腊发生的动乱都是由precariat领导的，但他与其说是支持这些precariat的事

业，不如说是利用这些precariat作为威胁，要求国家按照他想要的改革，规定所有人的基本收入。斯坦丁自己是一个左倾社会民主主义者，但这并不能阻止他的流行语被许多安那其和自治主义者采纳并使用。

这一理论所犯的基本错误是，那些被称为“precariat”的人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少数阶层（约占人口的25%），而不是一个与无产阶级背道而驰的单独阶级，当然也不会代替无产阶级行使社会变革和革命的作用。一方面，斯坦丁对无产阶级的定义是工业工人阶级，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人阶级中总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是极端不安全的，特别是在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时期。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不仅是工业工人或体力工人，还有白领工人——靠出售劳动力为生的人，无论他们是钢铁工人还是教师、建筑工人还是商店工人，都属于工人阶级。

因此，试图使所谓的“precariat”成为社会变革运动的战略基础，就是将工人阶级的阶级分裂开来，将运动限制在工人阶级中的极少数和社会上的极少数人，并切断他们与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接触，就是也工人阶级中包含着最大的经济实力的那部分人，打击资本主义的最大力量，它通过停止生产可以对资本主义造成最大的伤害。马克思称无产阶级运动为“为绝大多数人牟利益的，绝大多数人自觉、独立的运动”，其获胜能力就在于这里。将运动建立在少数人的基础上，依然是不能取胜的。

在内格里和哈特的*Empire*中，还写道，国家已经失去了作为资本主义权力中心的重要性。全球化产生了他们所谓的属于纯粹资本主义力量的“平滑空间”，在这种空间中，民族国家和国家间帝国主义的竞争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性。这一声明不幸地恰恰出现在911事件和紧随其后的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前，不得不说，它一直是错误的。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全球最大的零售公司沃尔玛（同样适用于大多数其他大公司）不可能在没有国家及其武装人员支持的情况下交易一天：它只会被穷人洗劫一空。在国际经济水平上，全球200强企业中90%以上依然拥有独特的国家基础，并与特定的国家机器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一句口号所说的：“没有麦当劳·道格拉斯就没有麦当劳！”

（There's no McDonalds without McDonald Douglas! ）”

当这个降低国家重要性的错误约翰·霍洛威在他的著作*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 (2002)中更加深一步时，错误就更加复杂了。对于内格里来说，国家在当前的“帝国”时代正在失去其重要性。至于霍洛韦，他对国家的看法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自成立以来的最初就有一个错误，并持续不断犯。他认为改革派和革命家、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追求的夺取国家权力的整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国家机器本质上是专制和压迫性的，“夺取”它只会导致复制革命所反对的同样的压迫。相反，霍洛韦主张建立独立于国家的有“自主”权力基础的战略，就像萨帕塔1994年在墨西哥恰帕斯所做的那样^[18]。

作为对工党和其他社会民主党做法的批评，这有一定的力量，但忽略了马克思在巴黎公社以后的文章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坚持的要点，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接管”资产阶级国家，而需要粉碎它。这种思路作为一种替代策略，并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萨帕塔起义在历史上处于国际抗争的低谷，在世界的统治者对共产主义的覆灭进行了胜利主义自我祝贺的时候极大地鼓舞了人们。但不得不说，这起义并没有成功地改变墨西哥，更别提世界了。此外，在恰帕斯的丛林中，在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开罗、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无法复制那种国家根本无法企及的世外桃源。只要对资本主义力量是一种威胁，那么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无限期地作为独立自主的空间得以维持。我们可能会试图忽视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会忽视我们。

约翰·霍洛威提出了不需要取得权力，而应该拒绝去用劳动创造资本主义、赞美体制的“裂痕”之类的这些诗意的革命辞藻来的想法，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改良主义的，而非革命性的战略，它为各种非政府组织、施压集团和竞选活动提供了激进的外衣。他们非常肯定地希望避免与国家对抗，要么是因为他们就是由国家资助的，要么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意推翻资本主义。

安那其纲领主义

安那其纲领主义是一个小而有趣的现象。它的名字和思想来源于1926年由内斯托尔·马赫诺、皮奥特·阿尔希诺夫（Piotr Arshinov）

和流亡巴黎的*Dielo Trouda*（工人的事业）组织中的其他俄罗斯安那其撰写的《自由共产党组织纲领》

（<http://www.nestormakhno.info/english/platform/general.htm>）。它具有当代意义，因为它激励了当今的一些小安那其主义团体，包括爱尔兰工人团结运动和北美东北安那其主义共产党联合会。

纲领是其作者体验俄国革命的产物，并强烈地受到了这一经验的影响。因此，它把安那其主义的弱点首先归因于它缺乏任何连贯的政治组织原则。它认为：

安那其主义不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思想，它是劳动群众的社会运动。因此，它必须**按照现实的和阶级斗争战略的要求，在一个组织中集结力量，不断鼓动。**

我们非常需要一个组织，一个聚集了安那其主义运动的大多数参与者的组织，在安那其主义中确立了一条**一般的和战术的政治路线**，作为整个运动的指南。

我们认为，解决一般组织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将活跃的安那其主义激进分子团结到一个立场鲜明的基础上：理论、战术和组织，即以或多或少完美的**同质化的方案** [原件中所强调的] 为基础。

这都是些惊人的话，什么是“一个组织”“一般的和战术的政治路线”和“同质化的方案”的“立场鲜明”的基础上呢？一个政党，一个非常列宁主义的政党怎么听起来那么像是它所描绘的东西呢？

更令人惊讶的是，《纲领》在其关于“保卫革命”的章节中不得不说的这些话：

社会革命威胁着社会上非劳动者阶级的特权和生存，这些阶级必然会挑起一场绝望的抵抗，这种抵抗将采取激烈的内战的形式……

正如俄国的经验所表明的，这样的内战不是几个月的事，而是几年的事。

无论工人在革命刚开始时迈出的最初一步多么令人高兴，统治阶级都将长期保持巨大的抵抗能力。他们将在以后的几年来发起对革命的攻势，试图重新征服他们被剥夺的权力和特权。

一支庞大的军队，军事手段和战略，资本——将全部被抛出来对抗胜利的工人……

为了维护革命所征服的，劳动者应该建立保卫革命的机关，以与任务规模相适应的战斗力的来对抗反动派的进攻……

……同所有战争一样，除非劳工适用所有军事行动的两项基本原则：行动计划的统一和共同指挥的统一，否则他们不可能成功地进行内战。当资产阶级开始在有组织的力量中反对革命，就是革命最关键的时刻到来了。这一关键时刻迫使劳动者采取这些军事战略原则。

因此，鉴于军事战略的必要性和反革命战略的威胁，革命武装力量必然要以**一支拥有统一的指挥和作战计划的革命军队**为基础。[我的重点-JM]

我之所以引用这么长的篇幅，正是因为从已宣明自己是安那其的人笔下读到这些台词太令人惊讶了。他们不仅承认了一个政党论点的本质，而且根据俄罗斯的经验，即一场真正的革命的经验，承认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国家论点的本质。

作者（以及他们的当代门徒）否认了这一点，正如他们否认他们的“一个组织”及其“同质的方案”是一个政党一样，他们拒绝“国家”和“权威”的“原则”。但这些否认是徒劳的。正如恩格斯和列宁所坚持的那样，国家的本质正是“人的武装的身体”。不论喜欢与否，革命的工人军队“有共同的指挥”意味着一个国家，就像它意味着一定数量的“权威”。没有什么文字游戏可以绕过这一点。

对于一个被纲领说服的安那其同志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合理地说，你已经得到了重要的见解——基于同质化的方案建立一个单一组织的必要性，处理暴力反革命和内战的必要性等等。然而，这些应该简单地被纳入安那其主义的框架。通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们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和党的理论中，给他们一个严肃的理论基础，这两者都比许多安那其所以为的更发达、更复杂、最主要的是更民主，从而更好地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

直接行动

马克思主义者和安那其在运动过程中经常不同意的一个问题是“直接行动”。要对“直接行动”作出确切的定义并不容易，因为该术语适用于各种战术，但一般来说，它指的是打破或违抗资本主义法律的抗议或抵抗行动，如街头静坐和封锁公路、占领建筑物、闯入军事设施、打破窗户和其他对财产的攻击。直接行动可能涉及暴力或明确的非暴力。显然，从美国的民权运动到格林汉姆普通女权主义者，到热那亚的反资本主义示威者，再到都柏林和伦敦的学生，许多不同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可以而且已经使用了直接行动的形式。罢工、纠察、占领工作场所的工人采取的正是一种直接行动。极右派和法西斯分子也可以采取直接行动，就像保卫英国联盟^[19]以清真寺为目标的行动一样。

那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和安那其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呢？也许安那其支持直接行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直接行动，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在很多情况下支持并采取直接行动。然而，这确实是有区别的。安那其主义曾经而且今天依然倾向于并且迷恋直接行动，坚持不采取其他形式的行动，并贬低其他形式的抗议。由此安那其倾向于通过直接行动提高的兴奋、危险、勇气和注意力，这种需要**超越**了参与和动员群众的需要。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直接行动是一种当且仅当它有助于的主要目标时，即提高广大工人阶级的信心，意识和斗争的时候才可以使用的战术。

显然，这里不可能有绝对的规则：这是一个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问题，我们都有时会犯错误。然而我认为，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对群众行动的强调是正确的。提高少数人直接行动的作用而低估制度

及其国家机器的无情和权力。例如，意大利的Tute Bianchi^[20]（“白色工作服”）认为，通过制定街头战斗的特殊战术（穿戴特殊衬垫等）来击败甚至阻止警察和国家的想法，在2002年在热那亚检验时，被证明是一种完全的幻想。国家不仅有装备了警棍、马、狗、催泪瓦斯等等的警察，还有枪和装备了火炮和坦克的军队。在街头对抗中，面对警察唯一可靠方法是像埃及一样，人数大大超过他们，而资本主义国家被整个打败的唯一方法是，当它面对数百万工人，它就会在内部崩溃。

大规模示威，即使他们是完全和平的，即使他们不能成功地改变政府政策，仍然在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对许多劳动人民来说，他们是第一次认识政治，第一次体验集体行动，可以产生强大的激进效应。它们还使人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集体力量，克服体制试图强加的孤立状态和原子化。因此，需要向那些意识刚刚发展，并且正在第一次——也许还在犹豫——步入运动的人开放行动形式。大型示威活动在国际上和国内也具有显著的宣传效果。例如，2002-2003年有**数百万人**游行反对伊拉克战争，尽管他们并没有阻止战争，但这向中东人民发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即西方普通民众不支持其政府的帝国主义侵略。这帮助中东的左派反对伊斯兰主义和恐怖主义潮流，并为未来的国际团结奠定了重要标志。

相反，对直接行动的痴迷可能导致献出大量精力的少数派和不太坚定的多数派之间的分离。前者可以与后者隔绝，并产生一种错觉，以为真正重要的是一小群局内人戏剧性的行为。这种包办主义可能对一个运动非常有害。革命是千百万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而不是别的谁来拯救他们。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动员工人阶级必须成为优先事项。

参加选举

几乎所有安那其都拒绝参加议会和其他官方的选举。他们会认为这一活动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完美表现，腐败、欺诈——无论谁赢得选举，资本主义社会都由资本和富人主导——以及对令人厌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马克思主义赞同这些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评，也否认

议会道路有通往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主张革命性地推翻议会，由工人委员会取代议会，但根据情况，有时主张参加选举。

这是因为革命者应当为了工人阶级意识觉醒，反对资产阶级媒体和资本主义政党（包括改良主义政党）的影响而进行斗争，资产阶级选举是这场斗争必须要打的地方。它们绝不是最重要的领域——例如，工会的斗争和罢工更为重要——但也不应忽视它们。我们对议会制度可能并不抱有幻想，但数百万劳动人民确实是抱有幻想的，包括许多声称为议会选举愤世嫉俗的人。选举时人们的注意力与在正常时期不同，他们集中在政治上，因此成为在选举中参选的候选人可以为向广大观众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提供重要的机会。

如果革命社会主义候选人当选地方议会或国民会议员，有效宣传的机会将大大增加。不仅宣传传单、演讲（议会内外），而且通过支持罢工、前往纠察线、参与占领和示威，以及学习如何从内部揭露并颠覆议会清谈俱乐部^[21]的虚假民主，在行动上进行宣传。正如我们所说的，我们不可能将议会转变为一个为工人阶级和人民工作的机构，但革命者依然有可能作为议会内部的护民官行动。

有些人，无论是安那其还是其他人，都因为资产阶级政治日常的令人作呕的谎言、虚伪和贪婪（**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而愤恨，他们会说，即使一个诚实的革命者踏入腐朽的议会制度，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会腐败。当然，这确实存在危险，就像有一些个人被选入工会的正式职位，为了改变这个制度给人们带来的使人妥协、顺从、变得一致等等的各种巨大压力。资产阶级在腐蚀工人阶级代表方面有着数百年的经验。因此，对这种活动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被出卖，确保其候选人意识到并武装起来，以抵御他们将受到的压力，并建立对普通民众负责的机制。最重要的是，运动或政党必须确保其重心，其政治活动的主要焦点仍然是在议会以外，是在工作场所和街头的阶级斗争。

只要采取这些预防措施，革命运动就可能在制度的议会堡垒内找到有政治力量为革命和工人阶级服务的个人。事实上，历史已经表明这是可以做到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国会大厦中社民党的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对者，是1919年德国革命的领袖，也是革命

的烈士，这是最有名的例子。贝纳黛特·德夫林，1969-74年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因参与自由德里^[22]的“博格赛德之战”而入狱，并在血腥星期天之后在下议院殴打保守党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23]，这是另一个例子，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人物。

安那其主义不参加选举的立场的问题在于，它把整个政治领域都抛给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阶级的忠实盟友、工党和改良主义政党。这样一来，它实际上有助于改良主义者，而这些人在任何严肃的对抗中都将背叛工人阶级，而且每天都会向人民传播资产阶级思想，以保持他们对工人阶级意识的控制。更糟的是，在劳动人民对社会民主的和劳动类型的政府背叛的经历失望的情况下，如一再发生的那样情况，如果在选举中没有更好的选择，人们就将存在严重的转向右翼和法西斯政党的危险。从希特勒到英国国家党^[24]，法西斯已经表明他们知道如何将议会和议会外政治结合起来。左派不能简单地洗手不干选举，给他们让出一条道路。

运动中的决策

在组织罢工、运动、示威和会议时，都必须作出决定。这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决定规模小，基本上很实际——会议是晚上7点还是晚上8点？有时是原则问题——这场运动是支持移民控制还是反对？有时，看似微不足道的实际问题包含着更大的政治和战略影响。例如，关于示威目的地的辩论可能实际上是在决定示威是否应完全和平或是否应在最后冒险与警察对抗。在设立会议时，将就议程、发言者等作出决定。那么，如何做出这些决定呢？

一种方法，在激进运动中经常发生，就是让一个“有魅力”或占统治地位的人指挥一切。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安那其所不能接受的。另一种方法，是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传统的民主投票。这会允许一定数量的权力下放给某种形式的“领导人”或“官员”，但基本原则是多数人决定。近年来，许多安那其和自治主义者被吸引到要求协商一致意见的决策中——只有决策中的（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同意的决策才能被承认。这些方法中哪种方法最好呢？

毫无疑问，在达成共识时，以协商一致意见作出决定是最好的。或者，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同意，可以相当迅速地达成共识，这也许是最好的。但在没有共识和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这将是一场灾难。这些情况确实会发生，而且总会发生。这是一场灾难，因为你要么作不出任何决定，要么你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除外）在没有决定集合地点和时间的情况下进行示威，或者在没有事先决定场地的情况下举行会议，或者是某一方决定打持久战，结果只能无休止辩论下去（这给那些不必早上起来上班的人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对“共识”的要求还允许人数极少但不懂得变通的少数人阻止和阻碍绝大多数人，从而使竞选和组织瘫痪。

投票决定也有其缺点。选票可能受到操纵或者不公平地影响，也可能被忽视。然而，民主投票却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一种基本方法。让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虽然是一个假设，但也是工人运动的日常情况。

A工作场所的五百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加薪10%。一周后，雇主提出5%的报价，工会官员建议接受，称这是目前最好的交易。劳动力内部是分离的。在五百人中，大约有一百人肯定地想接受，另外一百人同样肯定地想要继续战斗，相信还会取得更多的胜利。如何决定此事？没有达成“共识”的前景。如果每个人都只是做他们想做的事，罢工就会支离破碎，就会被打败。工会官员想命令大家回去工作。不！我们需要投票。雇主和州政府更喜欢邮寄选票，好让工人以个人的身份在国内投票。我们（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革命者等）会在辩论后举行的群众大会上争取投票，使一百名激进分子的论点有机会赢得三百名尚未决定的人的支持。

这是一个在运动中必须争取和捍卫的传统。工人（和革命者）必须习惯于投票，并在投票失败时接受投票。当然，会有一些票不能也不应该被接受——每个规则都有例外——但总的来说，只有人们接受被多数票击败，而不是分裂或退出，工会、罢工、占领、竞选和政党的团结和发展才可能得到维护。

第二个例子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实际事件——1917年十月革命。10月25日凌晨，赤卫队在苏联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列

夫·托洛茨基）的指挥下开始夺取该市的关键建筑。暴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上午10点，军事革命委员会（MRC）发表了一份声明：

“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权力已经移交给彼得格勒苏维埃机关的工人和士兵代表，即军事革命委员会，彼得格勒无产者和驻军的首长。”

此时，旧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仍然躲在冬宫内。与此同时，同一天，在同一城市，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来自俄国各地的工人委员会和士兵委员会的代表聚集在斯莫尔尼宫。起义是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旗帜下进行的。大会将对这次起义采取什么态度？如何决定这个问题？达成共识是不可能的一—大厅里就是起义的直接反对者，他们不久将离开去参加反革命，还有像孟什维克的马尔托夫这样希望达成妥协的人。显然，必须进行投票——事实上，有一系列的投票。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给出了一些数字：

对在起义时刻举行的代表大会代表的统计是极不完备的。开幕时总共有650名拥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布尔什维克得到了390个代表席位。

孟什维克连同列入他们之中的各个民族团体的代表总共还不到80人，而他们当中大约有一半属于“左人”。

159名（另据资料190名）社会革命党代表当中，左派占了大约五分之三；而且就在代表大会召开过程中右翼还在继续迅速减少。到代表大会结束之际，根据某些花名册，大会代表人数达到了900人……

在代表中间进行的调查表明，有505个苏维埃赞成把全部政权交到苏维埃手中，有86个苏维埃赞成“民主派”政权，55个苏维埃支持成立联合政府，另有21个苏维埃也支持联合政府，但要将立宪民主党排除在外。

（列·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伦敦1977年，第1146-7页）

要推翻国际资本主义，就必须有许多这样的工人委员会或者类似这样的机构，还有许多这样的投票。这是为什么民主投票的做法需要在运动中培养的第二个原因，以及阶级斗争的迫切要求。

马克思主义与安那其主义在生活方式主义、自治主义、纲领主义、直接行动、选举与投票主义的所有这些分歧，都有其共同的渊源。它们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明确地知道国际工人革命的目标，并试图从这一角度评估和思考所有战略和战术问题。安那其主义一直缺乏这种明确性，因此到处跳来跳去，有时被工人阶级的需求所拉扯，有时被其他社会群体所拉扯，有时又被其拥护者的情绪所驱使。

前进的道路

这本小册子的论点可以用一个短语“安那其主义赢不了”来概括。尽管安那其主义有着崇高的理想和英雄主义，但它缺乏推翻资本主义并实现这些那些理想的严肃战略。但我们迫切需要胜利：人类的整个未来都岌岌可危。

不仅这个世界的现状令人不可接受——358位亿万富翁控制着与全世界人口下半部分的总财富一样多的财富；10亿人在挨饿，而与此同时超过15000亿美元花在了武器上；银行家们经济危机的账单由美国、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爱尔兰、冰岛等国劳动人民和穷人支付；战争、酷刑、种族主义、压迫和镇压到处都是一——而如果资本主义依然留在这个世界上，情况将变得更糟。

2008年爆发的资本主义危机没有减弱的迹象。相反，在经历了一些小的复苏迹象之后——媒体对此大大肆渲染——它显然又在加深。随着爱尔兰、希腊、现在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在违约和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欧元区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从一次纾困到另一次纾困。奥巴马和美国政界人士正互相恐吓，而美国债务正接近14万亿美金的象征性极限。中国是现代经济的重大成功案例，曾被寄予希望成为世界经济的救世主，现在经济发展开始放缓，并开始担心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在非洲之角，有1000万人面临饥荒。

撇开经济危机的持续后果，许多国家的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可能爆发的更具破坏性的帝国主义战争不谈，还有环境灾难的定点炸弹。如果气候变化继续下去，而以竞争和贪婪驱动的资本主义阻止气候变化的可能性又很小，那么对人类造成的可怕后果可能会使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任何事物都相形见绌。在新奥尔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爆发的规模大得多的洪水；在达尔富尔、萨赫勒、埃塞俄比亚和非洲之角产生的规模大得多的干旱和饥饿：规模大得多的资源（是水而不是石油）战争；来自所有这些灾难的规模大得多难民。如果我们想知道资本主义会如何应对这些事件，那就看看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是如何反应的吧。

因此，真正有机会获胜的战略问题——虽然没有人能保证——至关重要。这种战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一支有能力改变世界的真正的社会力量。没有最好的战术，最崇高的目标，最大胆的计划，一切都不过是夸夸其谈的大话和一厢情愿的空想。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这种力量——国际工人阶级，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也是马克思最伟大的理论成就。

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是指那些靠卖劳动力为生，被资本家雇用和剥削的人。马克思把政治建立在工人阶级的基础上的不是因为它所承受的痛苦，而是因为它所拥有的力量。当然，工人阶级受到的痛苦和剥削是骇人听闻的，它使工人有动机和兴趣来挑战制度，但是几千年来，奴隶和农民也一直遭受和剥削。工人阶级与他们的区别在于：a) 它所能击败资本主义的力量，b) 它创造新社会的能力。

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独特的孩子。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工人阶级也随之扩张。资本主义可以在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中打败工人阶级，打断其罢工，粉碎其工会，限制其自由，但它不能不靠工人产生利润所以，死亡不属于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使工人集中在大型工作场所里，将他们与国家和全球工业联系起来，并将他们集中在大城市里。这使他们拥有潜在的巨大政治权力。没有他们的工作，就没有火车、没有公交车，没有卡车可以移动；就没有煤、没有铁、没有石油可以从地里产出；没有报纸可以印刷，没有电视台可以广播，没有银行也没有学校可以开放。即使是

国家的武装力量也依赖于他们的队伍中的工人。在创造工人阶级的同时，资本主义也创造了历史上最强大的被压迫阶级。

工人阶级的斗争，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集体斗争。从最小的地方运动，到针对大公司和政府的大罢工，工人必须共同行动。事实上，这种集体主义可能是个别激进分子和革命者沮丧的原因，因为工作场所的工人只有在大多数人准备一起行动时才能采取行动，但这正使得工人阶级可以成为社会主义阶级。要掌握生产资料，工人不能把它们分开（就像农民把土地分割开来），而必须把它们变成社会财产。

此外，当工人阶级掌权时，它仍然是社会中的生产阶级，在它下面没有其他阶级可以供其剥削并赖以生存。并且因为集中在作为经济和政治权力中心的大型产业和大城市，它有能力防止任何新的阶级出现在它之上；它将能够同时生产和统治，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无阶级社会的基础。工人阶级在解放自己的同时也解放了人类。

这，就是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马克思的一切主张中，没有一个像这一个一样被学者们和专家们如此断然地驳斥，包括那些“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工人阶级变了”，这是他们熟悉的叫喊。

是的，工人阶级变了，在工作、衣着、工资、国籍和文化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它的基本生存条件依然没有变：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孩子，仍然靠出卖其劳动力为生，仍然受到剥削，仍然作为一个集体挣扎；而在其规模和潜在的权力上，它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增长。在马克思的时代，无产阶级或多或少地局限于西欧，而今天它已经遍及五大洲，在各地战斗，从圣保罗到首尔，从广州到开罗。人类的希望就在于此。

经验已经表明，虽然还是漫长而痛苦的，工人阶级能够战斗，但要赢得胜利，就需要组织和领导，这首先意味着一个革命党。也就是说，工人阶级所确切需要的，正是那些各种形式的安那其主义所否认的。工人阶级在很多地方多次反对资本主义（1848年、1871年、1936年和1968年的巴黎；1919-23年在德国；1919-20年在意大利；1925-

27年的中国；1936年的西班牙；1956年的匈牙利，反对斯大林主义国家资本主义；1952年的玻利维亚；1970-3年的智利；1974年的葡萄牙，等等），并一次又一次地被偏转和击败，往往倒在血泊中。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一个真正的，虽然只是暂时的胜利——1917年的俄国革命，直到它被斯大林主义篡夺——而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一个在工人阶级中有着真正的根基的革命党的存在。

这样的革命党不可能在一天内建成。经验再次表明，在革命危机的热浪中，这是几乎不可能临时建立的。相反，它必须在革命之前就开始精心打造。它必须团结在一起，独立于改良主义者和工会官僚，在每个工作场所和每一个住宅区的工人阶级中找到最好的战士。它必须在斗争中运用自己的能力团结这个阶级的其余部分来武装自己；它必须知道如何前进，如何撤退，如何与自己队伍之外的人合作，有时包括改良主义者（当然，还有安那其），以及何时罢工才能给出决定性打击。它必须从历史中学习，并能够将其运用到今天。

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为何而复苏，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进行展望的同时，它也是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概括。因此，对于那些想要改变世界的人来说，所应当前进的方向就是建设工人的运动，发展工人的抗争，并在这个过程中建设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

Chris Harman, *How Marxism Works*

Alex Callinicos, *The Revolutionary Ideas of Karl Marx*,

Kieran Allen, *Marx and the*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London

2011 John Molyneux, *What is the*

Real Marxist Tradition

关于国家：

弗·伊·列宁,《国家与革命》

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关于领导和党

T, Cliff, C.Harman , D.Hallas,
L.Trotsky, Party and Class, London n.d
John Molyneux, Marxism and the Party,
London 1986.

关于安那其主义历史

George Woodcock, Anarchism, London 1975.
Hal Draper,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III: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New York 1986, and Vol IV:
Critique of Other Socialisms, New York 1990.
Andy Durgan,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in Spain' i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1, 1981.
Murray Bookchin, Social Anarchism or Lifestyle Anarchism: An
Unbridgeable Chasm,Edinburgh 1995.

关于俄罗斯和斯大林主义:

T.Cliff, 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C. Harman, Russia – How the Revolution was Lost
T. Cliff, Lenin, Vol 3: Revolution Besieged

关于自治主义:

Alex Callinicos, 'Toni Negri- in perspective' i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92,
2001.

关于社会主义:

Charlie Kimber and Joseph Choonara , Arguments for Revolution
John Molyneux, The Future Socialist Society

描述

[[←1](#)]

指2011年6月示威人群和政府在这里爆发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2]

意大利右翼政党力量党的创始人

[←3]

某英国社会民主主义者

[←4]

作者是托派

[←5]

链接是作者加的，中文版链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ngels/marxist.org-chinese-engels-1872-1873.htm>

[←6]

scabs, 指破坏罢工的人。

[←7]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hris-harman/index.htm>

[←8]

可是the Anarchist Library有不少他们的作品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

[[←](#)9]

作者名字John Molyneux的缩写

[←10]

中文版链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01.htm#9>

[←11]

中文版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5.htm#3>

[[←12](#)]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加的注释。

[←13]

岌岌可危的阶级，吃了上顿没下顿，雇佣状况不稳定的无产者。

[←14]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1890—1947），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比利时安那其主义革命家和作家。他一生矢志不移地捍卫俄国十月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传统和为反对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而作不懈的斗争，是托洛茨基的战友。非常关心中国1927年的革命，写了不少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中国托派领袖之一郑超麟就曾翻译和出版过他的作品。

[[←15](#)]

2001年八国峰会遭到示威游行抗议，一名示威者被意大利警察开枪打死，另外还有184人受伤，56名抗议者被捕。

[[←16](#)]

欧洲社会论坛（European Social Forum，简称 ESF）是欧洲另类全球化运动人士举办的年度会议。

[←17]

一个成立于1970年的意大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左翼军事组织，在1978年绑架并处决了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被意大利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被政府多次打击，现在已不再活跃。

[←18]

萨帕塔人是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的武装组织，为了保卫印第安人的利益而起义，建立了带有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性质的反叛萨帕塔自治市镇（**Municipios Autónomos Rebeldes Zapatistas**）

[[←19](#)]

英国极右翼组织，仇视伊斯兰教，曾被指控密谋用炸弹袭击清真寺。

[←20]

一个意大利激进的社会运动，活跃于1994-2001。

[←21]

光说不做的谈话俱乐部。

[←22]

1969至1972年间，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北爱尔兰德里建立的自治地区，组建了军队抵御英国政府的不断骚扰。警察与当地居民爆发各种冲突，1969年8月12日达到顶峰，发展为持续三天的博格赛德之战。三年后在博格赛德发生流血星期日事件，英国伞兵对游行的市民开枪，导致13名手无寸铁的人当场死亡，14人受伤，其中一人不治身亡。最后谈判破裂，英军出动装甲车和推土机将其镇压。

[←23]

因为他无视公民证词。

[[←24](#)]

英国极右翼政党，被认为是英国的纳粹党。